臺大歷史學報第 61 期
2018 年 6 月，頁 17-95

BIBLID1012-8514(2018)61pp.17-95
2018.2.26 收稿，2018.6.20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8.61.02

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專攻及其戰後遺緒（1928-1960）

周 婉 窈*

提 要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大）於 1928 年設立，其後身國立臺灣大學（臺大）於今年（2018）舉辦 90 週年校慶活動。學校建校歷史推算至日本時代，是解嚴後的趨勢。然而，1945 年的大變局影響臺灣至鉅，學校縱使有前後身之關係，其間斷裂恐多於承繼。本文選取臺北帝大文政學部史學科「南洋史學」作為研究對象，試圖重建該專攻（含同名講座）的歷史，及其戰後演變。

本文首先敘述臺北帝國大學設立的經過，並探討名稱由「臺灣帝國大學」變更為「臺北帝國大學」的原因。臺北帝大的創設宗旨，以臺灣・東洋・南洋之自然界及人文界為研究對象。這是以地理位置定義學術方向，也因此文政學部史學科有別於其他帝國大學，設有「南洋史學」之講座與專攻。透過資料整理，本文嘗試勾畫南洋史學的講座、編制、專攻，以及課程。

誰來讀南洋史學？以臺大校史檔案為根據，本文提出較為完整的圖景，尤其是鮮為人知的戰爭期景況。南洋史專攻的學生中，以中村孝志（1910-1994）與張美惠（1924-2008）最有關係，因此特詳予描述。張美惠「具體」過渡到戰後的臺大，另外受日本史學訓練、研究越南史的陳荊和（1917-1995）也加入教學陣容。張、陳二人延續臺北帝大的南洋史學傳統，惟因種種原因，二人相繼離開臺大。此後，臺大的南洋史研究中斷 26 年，最後由曹永和（1920-2014）賡續臺北帝大的南洋史研究。

關鍵詞：臺北帝國大學　南洋史學　海洋史　中村孝志　張美惠　陳荊和　曹永和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wanyaochou@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及其宗旨
二、「南洋史學」的出現：講座、編制、專攻、課程等
三、南洋史學專攻的學生們
四、張美惠、陳荊和：承先未能啟後
代結語：中斷的年代、再續前緣

前 言

而臺灣有是等東洋・南洋・太平洋方面之學術研究最便利之位置，故於此開設最高學府，利用其自然與人文，以舉我先進文明國之實績，此乃帝國之誇、至高之責務也。

——〈臺北帝國大學創設理由書〉[1]

最高學府設於臺灣，發揮位於東洋之大學之特色，以傳播我之文明於南方，此乃我帝國所以有助於東洋之進運，不可不謂貢獻於世界之文明。……

本大學名稱為臺灣帝國大學，而以臺灣〔此係無庸言〕・東洋・南洋之自然界及人文界為對象之學術研究……。

——〈臺北帝國大學創設說明書〉[2]

今年是 2018 年，90 年前，亦即 1928 年，是臺北帝國大學創校之年，該校在 1945 年之後的「後身」國立臺灣大學，最晚於 30 年前就承認這個前身。1988 年「台大創校六十大慶籌備會」出版了《榮耀與分享：台大創校六十週年特刊》，[3] 1998 年臺大稱該年為「國立臺灣大學創立七

1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1-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ヲ定ム，頁 11；以下簡稱〈理由書〉。
2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1-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ヲ定ム，頁 19；以下簡稱〈說明書〉。
3 陳明哲編，《榮耀與分享：台大創校六十週年特刊》（臺北：台大創校六十大慶籌備會出版部，19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週年」，[4] 2008 年也稱創校 80 週年，今年則是 90 週年，亦將舉辦慶祝活動。[5]在臺灣，各級學校在紀念創校多少週年時，將戰後的「後身」往前溯到日本統治時期的「前身」，加總來算。過去 2、30 年來，雖然沒有現成的數據可參考，但此作法顯然是個趨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士林國小，該校官網的「學校簡介・士林歷史」寫道：「本校於西元 1895 年（民前 17 年，清光緒二十一年）於芝山巖頂開漳聖王廟內創立『芝山巖學堂』迄今已有 120 年歷史，為全臺最早設立的國民小學。」[6] 這應該是 2015 年撰寫的校史，未加更新，目前網頁上的標語仍然是「飛躍 120・夢想在士林」。

這種將學校前身的創立之時當作創校「元年」的作法，在臺灣戒嚴時期（1949-1987），是不可能想像的。關於這種作法的政治、社會、文化，乃至於歷史認知和書寫的意涵，很值得研究，但這不是本文的主旨。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10 月中華民國當局代表盟軍來接收臺灣，這是代表盟軍從事軍事佔領，根據國際法，軍事佔領不等於取得主權，[7]但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民國卻將軍事佔領置換為主權移轉；[8]這個政治上的大變動對臺灣社會的各個層面帶來非常劇烈的斷裂，學校本身亦然。在此巨變下，特定學校的「前身」和「後身」，可能有一些面相仍得以延續，

4 見曹永和編，《臺北帝大的生活——國立臺灣大學創立七十週年校慶特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9）。

5 例如去（2017）年 8 月即開始徵求「國立臺灣大學創校 90 年校慶標語」，競賽活動簡章見 http://event.ntu.edu.tw/ntuslogan/rules/（2018 年 1 月 3 日檢索）。

6 士林國小網頁：http://www.slps.tp.edu.tw/introduce/leading.asp?id={BFB22B67-A86E-4499-980F-48D5DA832767}（2017 年 11 月 11 日檢索）。

7 陳隆志，〈台灣的國際法地位〉，《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7 期（1999 年 9 月，臺北），頁 6；姜皇池，《國際法與臺灣：歷史考察與法律評估》（臺北：學林文化，2000），頁 11-12。

8 關於這個過程，尤其是從美方的「臺灣佔領計畫」（Occupation of Taiwan）變成中方的「臺灣省收復計畫大綱」（請注意臺灣省的省字，亦即明確認定臺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可參考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臺北：衛城出版，2017），頁 56-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也有一些面相處於完全斷裂的情況，另外，影響更大的可能是「新生事物」。臺北帝國大學・國立臺灣大學（以下行文有時簡稱前者為臺北帝大或帝大，後者為臺大）也是這個大變局中的一環。要全面了解、分析一個特定學校的傳承、斷裂與新局，是非常浩大的工程，本文不以整個臺北帝大・臺大為研究對象，而是選取臺北帝大一個學科中的一個領域作為研究對象，試圖梳理其間的關係和演變。

筆者選擇以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的南洋史領域（含講座與專攻，詳下）為本文研究主題。原因何在？首先，對海洋史有興趣的學子，在臺灣海洋史研究大家曹永和（1920-2014）的傳記和各種口述紀錄中，大都會聽到「南洋史講座」一詞——它的正式名稱是「南洋史學講座」，惟「南洋史學」經常被簡稱為「南洋史」；曹永和的恩師岩生成一（1900-1988）是這個講座的教授。[9]到底臺北帝大的「講座」是什麼？在整個學部中居於怎樣的位置？

再者，中村孝志（1910-1994）回憶他在臺北帝大攻讀南洋史學時的語言要求，實在令臺大歷史學系畢業的筆者深感詫訝。他說：

> 要研究殖民地時代的東南亞史，至少必須要修習幾種語言。我們在高等學校時就修了英語和德語，在文政學部兩年的法語是必修的，更進一步被要求修習西班牙語及荷蘭語。因為大學三年級就要寫畢業論文，最遲在大學二年級後半階段不能不具有相當程度的語學基礎。因村上老師是歐洲語言學的大師，學生在大學一年級的後半階段開始利用午休的時間，接受課外的（例如像西班牙語）速成訓練。到二年級時用這樣的西班牙語開始講讀史籍。在此同時，學生被要求修習新的荷蘭語課程。大體隔年西班牙語和荷蘭語交替做為主修。[10]

9 如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訪問，吳美慧、謝仕淵、謝奇峰、蔡峙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頁 86；陳昀秀整理，周婉窈校訂，〈臺大歷史系八十週年系慶講座：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研究——曹永和教授主講〉，《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 2 期（2009 年 2 月，臺北），頁 6。

10「村上老師」指村上直次郎（1868-1966）。中村孝志撰，陳俐甫譯，〈台北帝大的日子〉，《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 年 4 月，臺北），頁 1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很難想像這種語言的要求，更難想像大一學生還要利用午休時間趕著學習歐洲語言，而這只是史學科中的一個專攻！

在今天政府努力推行「南向」政策的此刻，臺大歷史系才剛開始有非華僑史的東南亞歷史文化課程。[11]臺大在 2008 年開始提供東南亞語文課，2009 年也才有荷蘭文課程，[12]相比之下，落差甚大。那麼臺北帝大的這個南洋史學講座／專攻，到底怎麼一回事？它在戰後發生了什麼變革？本文企圖心不大，主要是想透過檔案和文獻，釐清南洋史學在整個臺北帝大・臺大的歷史位置，重建它的樣貌、它在戰後的遺續與斷裂，以及學術傳承的重新連結。

一、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及其宗旨

在殖民地臺灣設立帝國大學，並非理所當然，尤其是帝國大學層級的綜合大學；甚至它的名稱也不是一開始就訂為「臺北帝國大學」。倡議在臺灣設立殖民地大學，最早可追溯到阪谷芳郎（1863-1941）於 1899 年提出的〈臺灣大學設立關スル意見〉（〈關於臺灣大學設立之意見〉），但當時客觀條件上不具可行性，真正可行要到 1919 年 12 月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提出設立大學的構想；以此為背景，1920 年以《臺灣日日新報》記者久保島天麗為中心，成立「臺灣大學期成同盟會」。[13]該同盟會發行《臺灣大學設立論》一書，除了編者久保島天麗本身，撰文者皆為當時教育界、工商界的一時之選：

11 臺大歷史學系於 2016 年 9 月（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聘請兼任老師蔡秀敏博士開設「東南亞史」，以英語授課，這是「久違」多年的課，見本文第四節。

12 臺大的東南亞語文課，自 2008 年 2 月起，有泰文、越南文、馬來文、印尼文、菲律賓文；荷蘭文授課老師是方依思，見《台大課程網搜尋系統》：https://nol.ntu.edu.tw/nol/guest/index.php. 其他東南亞相關課程，可參考本文最後一條註釋。

13 李恒全，〈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史に関する一考察〉，《神戸大学発達科学部研究紀要》第 14 卷第 1 號（2006 年 10 月，神戸），頁 47-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隈本繁吉　前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長
高木友枝　臺灣電力會社長／醫學博士
木村匡　臺灣商工銀行頭取
羽鳥精一　三井物產臺北支店長
稻垣長次郎　臺北醫院長／醫學博士
堀內次雄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長/醫學博士
李延禧　臺北新高銀行專務取締役（按，李春生之孫）
東鄉實　臺灣總督府技師／農學博士
古野格　臺灣高等法院長／法學博士[14]

「臺灣大學期成同盟會」參與者的若干主張，顯然反映在後來臺北帝國大學的創設方向上。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在那個階段，倡議者提的是「臺灣大學」，並未觸及是否為「帝國大學」——這恐怕不是民間所能置喙的。眾人的主張各有異同，[15]具有高度共識的意見，有下列兩項：一、學生來源，以內地人（日本人）、臺灣人、支那人（中國人）、南洋學生為對象。[16]二、教學和研究以「南支」（南中國）、「南洋」為重點。[17]但對於到底要如何設立臺灣大學，有不同的看法；至於該大學是否為綜合大學，或先由分科大學設立起，論者看法也不一致。[18]關於學部，比較特別的是，有論者主張一定要設立文學部，且要有支那文學（中國文學）科。[19]

雖然眾人的共識是要收日、臺、中，以及南洋的學生，但大家也都

14 久保島天麗編，《臺灣大學設立論》（臺北：臺灣大學期成同盟會，1920）。
15 關於論者的重要主張，可參考李恒全，〈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史に関する一考察〉，頁 49，作者將眾人主張的要點列成表格。
16 久保島天麗編，《臺灣大學設立論》，頁 2、3、4-5、6、10、13、14-15、19、21-24。
17 久保島天麗編，《臺灣大學設立論》，頁 1、5、7、12、15、21、22、24。
18 如合併既有的專門學校、提升既有專門學校程度、專門設立一個大學等等，或採漸次設立分科大學，最後才設立綜合大學。久保島天麗編，《臺灣大學設立論》，頁 3、4、8-9、16-17、20、23。
19 久保島天麗編，《臺灣大學設立論》，頁 5、14。高木友枝、李延禧作此主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知道，在制度上，臺灣要設立大學，並同時收內地人和臺灣人是有障礙的，因此主張要先修法。首先，必須打開日臺共學之途；其次，臺灣此時並無設置大學的法源根據，教育分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門教育，以及師範教育。[20]當時在臺灣施行的教育是根據 1919 年發布的〈臺灣教育令〉，該令訂定了特殊的教育制度，據此在臺灣的日本人和臺灣本地人分開在不同的學校系統上課。1922 年臺灣總督府發布第二次〈臺灣教育令〉，除了初等教育（約等同小學教育）之外，其他各級學校皆根據日本內地的法令，如此一來，確立了初等學校以上的內臺（日臺）共學制度；由於內地有大學，因此新教育令第 10 條規定：「……大學教育及其豫備教育依據大學令。」以此，上述二大問題方才獲得解決。論者因此認為在殖民地臺灣設立大學一事，在 1922 年田健治郎總督時就已經提出，[21] 1925 年伊澤多喜男（1869-1949）總督時將之具體化，該年度總督府預算列有「帝國大學創設準備費」——請注意這時已確定為「帝國大學」，不是普通的殖民地大學。1926 年總督府預算中列有「大學新營費」項目，同年春派遣預定將來擔任教授之教官至國外考察進修、收置校用土地，建築一部分校舍等。伊澤總督委任幣原坦（1870-1953）負責籌辦，[22]幣原坦後來成為第一任臺北帝國大學總長（校長）。[23]

關於在臺灣設立大學，一般人的看法是以設立實業大學，即醫學部與農業部程度而已，[24]但在伊澤多喜男總督的構想中，臺灣大學是有法

20 吳密察，〈植民地に大学ができた！？〉，收入酒井哲哉、松田利彦編，《帝国日本と植民地大学》（東京：ゆまに書房，2014），頁 45-74、82-83。

21 〔第一次〕「臺灣教育令」與〔第二次〕「臺灣教育令」，見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南天書局，1995 復刻 1939 年版），頁 93-96、113-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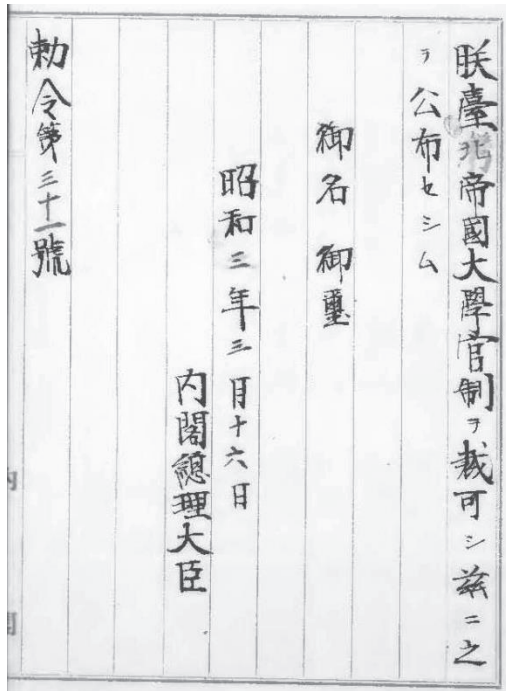
22 松本巍撰，前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手稿本）（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臺灣舊籍影本），頁 1-2。

23 關於幣原坦和臺北帝國大學的關係，可參考瀧井一博，〈植民地帝国大学のエートス——台北帝国大学初代総長幣原坦の思想形成〉，收入酒井哲哉、松田利彦編，《帝国日本と植民地大学》，頁 45-74。

24 松本巍撰，前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頁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部、文學部及理農學部的綜合大學。[25]另外，這個大學也從殖民地一般大學提高到帝國大學的位階。最值得注意的是校名，在最後關頭才從「臺灣帝國大學」改為「臺北帝國大學」。理由是：最初擬訂名稱為「臺灣帝國大學」，後為求與日本國內帝國大學命名原則一致起見，改為「臺北帝國大學」。[26]臺北帝國大學是根據 1928（昭和三）年 3 月 16 日敕令第三十一號設立的，在這之前內閣總理大臣的文書都還稱它為「臺灣帝國大學」。1928 年 2 月 27 日內閣總理大臣男爵田中義一（1864-1929）提出的「臺灣帝國大學官制制定ノ件」，文件名稱維持「臺灣大學」之稱，但內文「臺灣帝國大學」的「灣」顯然被塗抹掉，在其上改寫「北」（見圖一）。[27]然而作為參考資料的〈說明書〉卻仍維持「臺灣帝國大學」，[28]可能漏了修改。



圖一　日本內閣文書顯見「臺灣帝國大學」塗改為「臺北帝國大學」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1-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ヲ定ム，頁 4。

25 李恒全，〈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史に関する一考察〉，頁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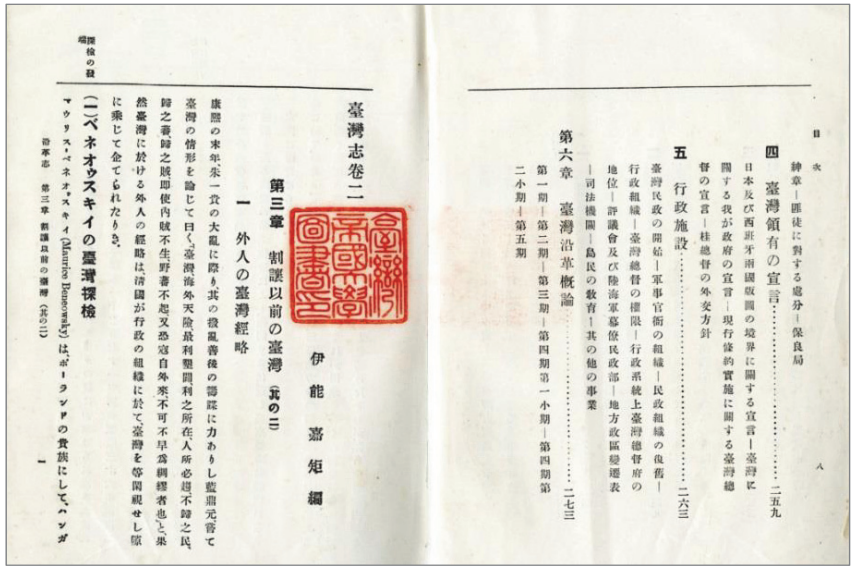
26 松本巍撰，蒯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頁 1。

27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1-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ヲ定ム，頁 4、5、7、8、9。

28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1-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ヲ定ム，頁 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帝國大學在最後關頭改為臺北帝國大學，留下不少具體的痕跡。最明顯的是，該校在籌備期間，圖書館已經刻了「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的印章，也在入藏圖書上蓋章。例如伊能嘉矩文庫的藏書在 1928 年 3 月 17 日開始入藏，[29]蓋的圖書館章是「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圖二），後來才又補蓋「臺北帝國大學圖書印」。在 2017 年臺大圖書館舉辦的「觀風蹉跎：伊能嘉矩的田野歷程書誌展」[30]中，就可看到兩印蓋在翻開的一本書的左右面上（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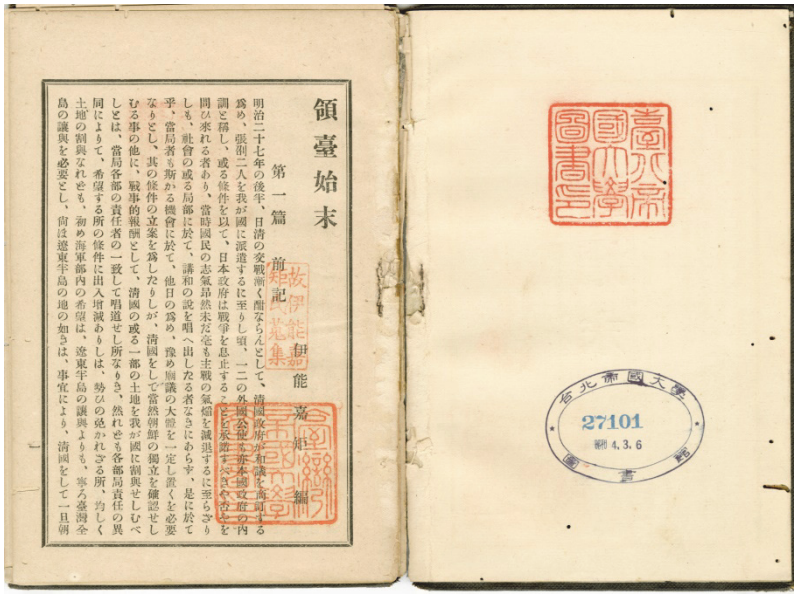
圖二　蓋著「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的伊能嘉矩著作

資料來源：臺大圖書館特藏組提供。

29 陳偉智，《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附錄三　伊能嘉矩年譜」，頁 277。

30 展期：2017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8 年 1 月 12 日，實際上延至 2018 年 2 月 9 日才撤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三　伊能嘉矩編的《領臺始末》，右頁蓋「臺北帝國大學圖書印」，左頁蓋「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

資料來源：臺大圖書館特藏組提供。

由於早先成立的東北帝國大學、九州帝國大學，以及北海道帝國大學都以地區為名，在殖民地臺灣的帝國大學命名為「臺灣帝國大學」，應屬順理成章，何以必須改名？曹永和曾指出：「臺灣帝國大學」這樣的名稱會讓人覺得好像有一個「臺灣帝國」，因此才改而沿用都市名稱，改成「臺北帝國大學」。[31]我們無法確定臺北帝大的改名——顯然最後一刻才決定變更——就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倒是早於臺灣、於 1924 年在朝鮮設立的「京城帝國大學」（1926 年才開始收大學生，之前是預科階段），可由前一年（1923）成立的「朝鮮帝國大學創設委員會」之名稱推知，理當命名為「朝鮮帝國大學」，但確實因為當局顧慮會有「朝鮮帝國的大學」的誤解，才改為「京城帝國大學」。[32]由於臺灣不像朝鮮曾是國

31 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頁 86。

32 天野郁夫，《帝国大学——近代日本のエリート育成装置》（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7），頁 56-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不容易引起「國家」或「帝國」的聯想，加上幾乎是最後一刻才改名，可見這樣的擔憂不是那麼明顯；此一改稱很可能不是比照「東京帝國大學」和「京都帝國大學」，而是比照「京城帝國大學」。於此附帶一提，日本「帝國大學」的帝國，雖然英文是「imperial」，其實比較上是取國家之意，即「national」。[33]這不是沒有道理的，東京大學於 1877 年創立，1886 年改名東京帝國大學時，日本還沒領有臺灣和朝鮮，稱不上是「empire」意義的「帝國」，亦即擁有殖民地、統治異民族的帝國。1886 年發布的「帝國大學令」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帝國大學之目的在於教授應國家之須要之學術技藝，並攷究其蘊奧。[34]請注意是應「國家」之須要，可見帝國和國家同義。

關於臺北帝國大學的創立過程，還有兩件事值得注意：一、大學校址最初考慮設在臺中市，後來決定設在臺灣總督府所在地的臺北。[35]二、原本預定先設立理學部和文學部，經過討論和折衷後，決定在文科上加法科，在理科上加農科，但法科後來改為政科，最後設立文政學部和理農學部；不稱「文法學部」而稱為「文政學部」，是很特別的。[36]

臺北帝國大學還沒正式成立之前，臺灣總督府為提升師資，表現出大手筆。筆者曾聽曹永和教授回憶臺北帝大教授時，提到移川子之藏（1884-1947）就職臺北帝大之前到歐洲遊學，購買大量圖書，當時覺得很特別。其實這是日本明治初期文部省為了快速充足帝國大學教授陣容而形成的留學生派遣制度，從 1875 年至 1940 年，綿亙 65 年，共派遣 3,209 人到海外遊學；留學生之派遣和歸國後就任帝國大學的講座之間

33 參見天野郁夫，《帝国大学——近代日本のエリート育成装置》，頁 3-4。

34 原文：「第一条　帝国大学ハ国家ノ須要ニ学術技芸ヲ教授シ及其蘊奥ヲ攷究スルヲ以テ目的トス。」見「帝國大學令」（明治十九年敕令第 3 號），引自《中野文庫・帝國大學令》，http://www.geocities.jp/nakanolib/rei/rm19-3.htm（2018 年 6 月 2 日檢索）。

35 松本巍撰，蒯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頁 1。

36 李恒全，〈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史に関する一考察〉，頁 50；天野郁夫，《帝国大学——近代日本のエリート育成装置》，頁 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密切的關係。[37]這個制度在新設立的帝國大學教員養成上，扮演重大的角色。根據研究，臺北帝大教授候補者在開講前赴歐美留學，留學年限 2 年，在本大學開學時赴任；在海外可自由購入研究上或指導學生上必要的儀器和圖書。[38]文政學部和理農學部從 1925 年度到 1927 年度共派遣 36 名「在外研究員」（正式名稱「文部省在外研究」）。大學開設後，因為講座增加，仍繼續派遣，計 34 名。在外研究員停留時間最長 2 年 3 個月，最短 8 個月，平均 1 年 7 個月；前往的國家以停留次數計算，依序為：英國（含英領印度）、美國、德國、法國（含法屬印度支那）等。說這是大手筆，因為根據 1927 年 4 月 9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臺北帝國大學創設準備費的支出是 492,617 圓，在外研究員的費用總支出是 1,531,803 圓，[39]後者是前者的 3 倍多。

臺北帝國大學的創設宗旨，可從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提出的官制制定文書中所附的〈理由書〉和〈說明書〉中清楚看到。〈理由書〉有兩個重點，其一、臺灣位於東洋、南洋、太平洋地域（方面）之學術研究最便利的位置，於此設立最高學府，利用其自然和人文，以顯示日本作為先進文明國之實績；其二、在臺灣設立高等學校（按，臺北高等學校於 1925 年設置三年制高等科，等於大學的預科）就是以在臺灣設立大學為前提，1928（昭和三）年 3 月第一批學生即將畢業，設置大學一事有其急迫性；雖然擬欲設置具備諸學科之綜合大學，然無法一開始就完備，因此止於開設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作為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基礎，以開啟臺灣特殊研究之道。[40]在這裡，我們看到臺灣的地理位置是臺北帝大的「天命」——必須負起教授／研究東洋、南洋、太平洋的使命。

37 關於日本海外留學制度，參見辻直人，〈二十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文部省留学生の派遣実態とその変化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東京大学史紀要》第 26 巻（2008 年 3 月，東京），頁 21-38。

38 松本巍撰，蒯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頁 7。

39 李恒全，〈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史に関する一考察〉，頁 50。

40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1-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ヲ定ム，頁 10-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明書〉比〈理由書〉詳細，據說是幣原坦親自草擬，[41]篇幅較長，對臺北帝國大學的創設宗旨有進一步的解說。〈理由書〉和〈說明書〉皆以日本近代文語（文言文）寫成，不易徵引，經筆者整理之後，歸納出〈說明書〉的二大重點。第一個重點在於創設之宗旨和功能：一、地理位置決定創校宗旨。臺灣位於帝國的南端，介於南支（南中國）大陸和南洋諸島之間，必須發揮位於東洋之大學的特色，將我之文明傳播於南方、有助於我之帝國的東洋進運，且貢獻於世界之文明。二、對於日本國民和南支、南洋學生的功能。使我國民往南方發展，臺灣實為其絕佳之階梯，在臺灣開設南方文明研究之中心，使獲得預備之知識、給予發展之要素之便。隨大學業績之顯著，必有由南支、南洋之學生來遊者，對於彼等，給予研學之便，使彼等知悉日本文明之真價、誘發民族互相之諒解，有助於開展東洋文明之新機運。

〈說明書〉第二大重點屬於實務面，首先是臺北帝國大學的學生來源。主要是希望在臺日本人（內地人）的子弟能留在臺灣就讀大學，獲得適切之知識，擔負起以臺灣為中心而活躍的使命。至於本島人（臺灣人），大多到日本內地讀私立大學，能進官公立大學的不多，只看到內地的黑暗面，或受到不良思想的影響，造成統治上的障礙。若到中國（支那）讀大學，近年則感染排日和赤化之惡風。在臺灣開設大學，可傳布健全之思想、授予正當之知識，打開使學生在臺灣學習之途，預防其弊害。其次，臺灣總督府設立高等學校的前提是：在臺灣設置能收容高等學校之大部分畢業生的大學；以此，從 1928 年起即預定要有大學的開講。最後，臺北帝國大學是官立之綜合大學，將來各種學部必須完備，但礙於當前情況，先設置人文科學及自然科學之基礎者，同時打開於臺灣特殊之研究的道路；於茲先設置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42]以上是臺北帝國大學創設〈說明書〉的主要內容，關於兩學部的講座問題，留待下面處理。

41 松本巍撰，蒯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頁 4。

42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1-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ヲ定ム，頁 13-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北帝國大學創設〈說明書〉中述明該大學創設的方針，茲迻譯於下：

> 本大學名稱為臺灣帝國大學，而以臺灣〔此係無庸言〕・東洋・南洋之自然界及人文界為對象之學術研究；並使達成高等學校畢業者之諸般修學之目的；又且在新領土樹立帝國之學術上之權威而確保統治之威信……。[43]

簡單來說，臺北帝國大學有三大方針，第一，以臺灣、東洋、南洋為研究重心。第二，讓臺北高等學校[44]畢業生有大學可讀。第三，在新領土宣傳帝國的偉大。第二屬於實務面，第三是統治的義理，可不去討論；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點，也就是臺北帝國大學負擔的研究使命，這大大影響到講座的設立，以及教學的方向。

臺北帝國大學創立之初有文政學部和理農學部，在第一學年度兩學部各設有 12 和 10 個講座，第二學年度文政學部增設 4 個講座；理農學部增加 9 個講座。[45]

在這裡，我們必須回到臺北帝國大學創設宗旨的三個關鍵詞：臺灣、東洋、南洋。整體來說，無論是文政學部還是理農學部，研究方面都是以臺灣為中心，擴大到東洋和南洋。1928 年 2 月 25 日內閣提出閣議的〈說明書〉有很清楚的說明：

> 在文政學科方面有其他大學所不能求之南洋史學，又設有土俗學與

43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1-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ヲ定ム，頁 19。

44 臺北高等學校歷經幾次改名和制度調整：（1）1922 年設立「臺灣總督府高等學校」，為七年制的高等學校；（2）1925 年設置三年制的高等科；（3）1927 年改稱「臺灣總督府立臺北高等學校」。在 1941 年臺北帝國大學設立大學預科之前，臺北高等學校畢業生是臺北帝國大學預期錄取的學生。不過，他們可選擇就讀日本內地的大學，反之，日本內地高等學校畢業生也可選擇來臺灣就讀臺北帝國大學。關於臺北高等學校，可參考蔡錦堂，〈日本治臺後半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收入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2），頁 316-317。

45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人種學講座，特別在臺灣有其意義。在心理學方面著重民俗心理學。如言語〔學〕方面，教材多取東洋・南洋各地的言語。在倫理學方面，破除從來只講西洋倫理學型，在此講座中特別含配有東洋倫理學。加之在其他之大學，稱作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學等課程完全改為東洋哲學、東洋文學，用「東洋」二字的含義，不局限於中國，廣泛地注目於東洋一般發揮此一特色。政治學、經濟學及諸般的法學，其教材從東洋事例作為說明之資料。
>
> 在理農學部方面，一切的學科是以臺灣為中心〔之〕熱帶、亞熱帶作為對象進行研究，取其特有的動物、植物生產等作為資料，在內容上有顯著特徵，毋俟言說。要之，文政學部或理農學部在東洋、南洋及熱帶諸研究上，在臺灣帝國大學與已成立之大學有許多前所未見之特色，縷述如上已足資證明。[46]

以此，我們清楚看到臺北帝國大學，不論是人文科學或自然科學，都是要以臺灣・東洋・南洋為中心，即使「事例」也是要採取東洋的事例，甚至倫理學也是要包括東洋倫理學。也就是在這個脈絡下，才能了解為何第二學年度很快就增設「南洋史學」講座。

二、「南洋史學」的出現：講座、編制、專攻、課程等

在深入探討南洋史學的出現之前，我們必須說明何謂「講座」？戰前日本帝國大學的講座制度和現在講座的用法很不一樣，關於講座制，有其歷史演進，簡要來說，從文部大臣井上毅（1844-1895）時代，即1893（明治二十六）年開始引入。它是研究的組織編制，帝國大學最初

46 引文中文翻譯，根據松本巍撰，蒯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頁 9；惟標點符號略加調整，〔〕內係筆者的補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編制是一講座一教授（或一助教授），1926（大正十五）年改成教授 1 名、助教授 1 名，助手則依據講座的性質不同而有差異，約 1 至 3 名，教授被要求「明確化專攻責任」。[47]日本「帝國大學令」於 1886 年發布，1919 年以「大正八年敕令第 12 號」發布的「帝國大學令」（第二次「帝國大學令」），對講座就有明文規定，即「關於講座之設置及廢止之諮詢事項」，由帝國大學評議會審議之；至於「講座的種類及其數目，別以敕令定之」，[48]可見其層級之高。松本巍（1891-1968）在《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說講座「相等於我國某一種科學所設立之研究室」（按，此處「我國」指中華民國），[49]是個很鬆散的比擬。實際上，臺北帝國大學的人事與講座的法令根據，即「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和「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50]都是以敕令發布的，改正時也是如此，法的位階非常高。講座不同於研究室，不是想設就可以設的。

那麼，「講座」和學部、學科到底是怎樣的關係？首先我們必須將帝國大學分為研究和教學兩個面向，才比較容易掌握。簡單來說，講座是隸屬學部的研究單位，例如，1928 年 3 月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有「國語學・國文學」、「西洋文學」、「東洋文學」、「哲學・哲學史」、「東洋倫理學・西洋倫理學」、「心理學」、「土俗學・人種學」等 12 個講座，[51]都是研究單位，它們未必有我們今天熟悉的科系來相應。文政學部有 4 個學科，每個學科之下各有若干「專攻」，構成「學部—學科—專攻」的層級關係，相對於講座是研究編制，學科和專攻則是教學單位，由學部內的教授會來決定。[52]講座是學部下個別的專門研究領域，

47 參見邱景墩、陳昭如，〈戰前日本的帝國大學制度與台北帝國大學〉，《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頁 4。

48 「帝國大學令」（大正八年敕令第 12 號）第 7 條第 2 項、第 12 條，見《中野文庫・帝国大学令》，http://www.geocities.jp/nakanolib/rei/rt08-12.htm（2018 年 6 月 2 日檢索）。

49 松本巍撰，前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頁 7。

50 分見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ヲ改正ス，頁 19-23、23-25。

51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ヲ改正ス，頁 23-24。

52 日文原文為「審議」，「帝國大學令」（大正八年敕令第 12 號）第 9 條第 1 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通常 1 個領域有 1 位講座教授，但大領域亦有設 2 個講座的。每一講座，由講座教授統籌該研究領域的運作，其下配有助教授（副教授）、助手（助教）、行政人員等。講座和講座之間是平等的，直接隸屬學部。不過，就學生修習課業而言，也就是從教學的角度來看，「專攻」是特定學科下的專門領域（類似美國大學的 major），例如史學科之下有 3 個專攻（專門領域／major）：國史學、東洋史學、南洋史學。作為研究編制的講座，並非都有同樣名稱或相對應的學科或專攻，例如「土俗學・人種學講座」儘管約等同今天的人類學，在當時的臺北帝大文政學部卻沒有類似的學科和專攻。也就是說，研究編制和教學單位未必吻合。不過，史學科的 3 個專攻都必修名為「土俗學・人種學」的課，[53]由「土俗學・人種學」講座提供。

以此為基礎，讓我們回到臺北帝大的組織結構來定位南洋史學。根據〈說明書〉，臺北帝大的人文科學在作為基礎的文學科之上，配以政治經濟和法律相關學科；自然科學則在作為基礎的理學科之上，配以應用科學的農學相關學科，以此設置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文政學部分為 4 個學科：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政學科；理農學部分為 4 個學科：生物學科、化學科、農學科、農藝化學科。[54]兩學部各 24 個講座，但無法一次完備，預定如下依序設置：

昭和三年度（1928）：文政 12 ＋理農 10
昭和四年度（1929）：文政 8 ＋理農 10
昭和五年度（1930）：文政 4 ＋理農 4 [55]

也就是在 3 個學年度內，兩學部預計各設置 24 個講座。

當時設置講座有兩種情況，其一是在開始授業前有準備期，約於前一年度結束前 4、5 月成立；其二是授課時成立（至於何以有這兩種不同

53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47-48。
54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1-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ヲ定ム，頁 19-20。
55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1-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ヲ定ム，頁 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方式，待攷）。[56]臺北帝國大學於 1928 年 4 月開學，12 月內閣就提出「官制改正」案，以敕令公布之。主要是增設有準備期的講座，教授、助教授、助手、行政人員等配置也隨之增加。[57]文政學部在原有的 12 講座，先增設 4 個講座；理農學部在原有的 10 個講座之外，增設 9 個講座。[58]由於理農學部和本文題旨無關，姑略去不談。那麼，文政學部原先的講座為何，新增設哪些講座？

文政學部原先的 12 講座如下：

1 國語學・國文學　2 西洋文學　3 東洋史學　4 土俗學・人種學

5 哲學・哲學史　6 東洋倫理學・西洋倫理學　7 心理學　8 憲法

9 行政學　10 經濟學　11 民法・民事訴訟法　12 刑法・刑事訴訟法[59]

於下年度開始前新增設的 4 講座如下：

1 南洋史學　2 東洋哲學　3 教育學・教育史　4 政治學・政治史[60]

最值得注意的是，南洋史學和東洋哲學兩個講座的增設，和臺北帝大的創設宗旨緊密扣連，即以臺灣、東洋、南洋為研究重心。

以上是先設置的 4 個講座，另外 4 個是授課時成立。通常 1 個講座配有 1 名教授，但未必各有 1 名助教授和助手。在文政學部完成設置 24 個講座之後，共有 24 名教授，助教授則有 14 名，助手 7 名。南洋史學剛好是教授、助教授、助手各 1 名，[61]頗為齊全。只有 1 位教授而沒有助教授和助手的講座，共有 6 個。[62]理農學部則是 24 個講座有 24 名教

56 松本巍撰，蒯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頁 12，見表格備考說明。

57 人員配置之變更如右，「→」表變更：教授 13→35 名，助教授專任 9→28 名，助手 6→34 名。

58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21。

59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23-24。

60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14。

61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29-30。

62 即言語學、憲法、行政法、政治學・政治史、法律哲學、刑法・刑事訴訟法。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29-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授，助教授配置 24 名，助手 48 名。[63]這大概是因學科性質殊異，而有不同之需要所致吧。

文政學部增設南洋史學講座時，教授是「在外研究員」村上直次郎，[64]他到荷、英、西、葡四國以及荷屬爪哇遊學 8 個月（1928 年 6 月 4 日-1929 年 2 月 11 日），[65]於 1929（昭和四）年 4 月開始授課。村上直次郎擔任講座教授到 1935 年 9 月；岩生成一從 1929 至 1935 年擔任助教授，在村上直次郎離任後，他於 1936 年 3 月升任講座教授，直至 1945 年。助手箭內健次（1910-）則於 1936 年 11 月起擔任講師，1938 年 5 月升任助教授，直至 1945 年。[66]

在具體討論作為講座和專攻的南洋史學之前，有必要了解臺北帝國大學創校之初的概況。首先，以現在的概念來說，臺北帝大是一所研究型大學，師生比很高，某些學科教師人數甚至超過學生。臺北帝大文政學部前 3 年的學生預定名額見表一，但 1928 年本科與選科的實際學生數，分別僅有 19 與 5 位（選科指「選科生」[67]）。

同一時期（1928 年 9 月 1 日），文政學部共聘有 12 名教授、6 名助教授（4 名待定）、4 名助手（1 名待定），共 22 名，扣掉還沒聘定的 5

63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30-32。

64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57。

65 李恒全，〈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史に関する一考察〉，頁 52。

66 見葉碧苓，〈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比較（1926-1945）〉，《臺灣史研究》第 16 期第 3 卷（2009 年 9 月，臺北），頁 122，表三：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師資一覽表。

67 見〈臺北帝國大學通則・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昭和三年三月十七日認可）〉第七選科生第 24 條至第 28 條，收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41-44。根據廖述英所述，「選科生」即：有意選擇學部中某些科目修習學分者，透過筆試或口試合格後，可入學為「選科生」，修完學分後，學部長（即今院長）會給予證明書。廖述英（筆名杜英），〈臺北帝大總共收過多少個女學生？〉，《台北帝大專欄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部落格，2018 年 2 月 15 日，https://taihokuimperialuniversity.blogspot.tw/2018/02/blog-post.html（2018 年 2 月 15 日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名，也有 17 名教師。若只計本科生，師生比近乎 1：1。[68]當時史學科只有東洋史學一個講座，有教授藤田豊八（1869-1929）、助教授桑田六郎（1894-1987）、助手前島信次（1903-1983），共 3 人，學生才 2 人。[69]

表一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1928-1930 年預定招收學生名額

年　　度			哲學科	史學科	文學科	政學科	合　計
1928（昭和三年度）	預定名額		12	5	10	20	47
	實際人數	本 科	2	2	4	11	19
		選 科	1	1	1	2	5
1929（昭和四年度）	預定名額		32	20	25	40	117
1930（昭和五年度）	預定名額		52	35	40	60	187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32、33。

理農學部昭和三年度預定收 40 名，實際有 40 名學生（1 名休學），而教授、助教授、助手共 40 名，扣除 16 名待定，實際有 24 位教師。教師若全部聘齊，師生比剛好 1：1。[70]隨著學生數增加，師生比當然會隨之降低，但基本上，臺北帝國大學在師生比方面，遠非今天的國立臺灣大學所能望其項背。

此外，我們必須回頭探討臺北帝大的學生來源，才能進一步了解南洋史學的學生出身情況。根據〈臺北帝國大學創設說明書〉，學生來源預期以在臺內地人（日本人）、本島人（臺灣人），以及中國和南洋學生為對象，但實際結果並不如預期。

68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27-28、32、33。

69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27。

70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28-29、32-33、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首先，臺北帝國大學創立的一個實務理由是，收容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的畢業生。該校第一屆畢業生於 1928 年 3 月畢業，共 74 名，[71] 卻只有 8 名（無臺灣人）申請進入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33 位（3 名臺灣人）申請進入理農學部，共 41 名，[72]僅占 5 成 5。至於文政學部共有 51 人申請入學，取 20 名，8 名來自臺北高等學校，全員錄取；另有 6 名來自日本本土高等學校的申請者，錄取 5 名。另外 37 名申請者來自臺灣和日本本土 19 間學校，包括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臺北醫學專門學校、臺北高等農林學校、橫濱高等商業學校、法政大學豫科、早稻田第二高等學院、同志社大學豫科等。20 名錄取者中，只有 3 名是臺灣人。[73]理農學部的入學情況比較單純，共 55 人申請入學，錄取 40 名，除了上述 33 名來自臺北高等學校，全員錄取外，其餘 22 名申請者也都來自日本本土的 12 所高等學校，從中錄取 7 名。[74]換句話說，文政學部的學生來源比較多元。

南洋史學屬於史學科，在日本本土的 7 所帝國大學，史學科有 3 專攻，即國史、東洋史學、西洋史學；[75] 1926 年在殖民地朝鮮成立的京城大學，以朝鮮史學取代西洋史學，1928 年在殖民地臺灣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則以南洋史學取代西洋史學。[76]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 3 個專攻修習課程，如表二所示。

由表二可知，史學科 3 個專攻的課程結構幾乎一樣，只是專攻科目要求更多單位數。關於 1928 至 1941 年之間的變動，見本文後附「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共通及各專攻必修科目變革表」（附表一）。

7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位校史館‧臺北高等學校 1922-1949》，http://archives.lib.ntnu.edu.tw/exhibitions/Taihoku/chronology.jsp（2018 年 1 月 25 日檢索）。

72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35-36、40-41。

73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35-36。

74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頁 40-41。

75 「國史學、東洋史學、西洋史學」是以講座實際內容來說，名稱容或有異，例如京都帝國大學的西洋史學講座稱為「史學地理學第一講座」，其實就是西洋史學。見京都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史》（京都：京都帝國大學，1943），頁 681-682。

76 葉碧苓，〈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比較（1926-1945）〉，頁 1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二　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各專攻必修科目（1928）

	國史學專攻	東洋史學專攻	南洋史學專攻
專攻者必修科目	國史學概說 國史學特殊講義 國史學講讀及演習（7） 土俗學・人種學（1） 東洋史學（3） 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2） 南洋史學（1）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及政學科之科目中選（4）	東洋史概說 東洋史特殊講義 東洋史講讀及演習（6） 土俗學・人種學（1） 國史學（3） 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2） 南洋史學（1）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及政學科之科目中選（5）	南洋史概說 南洋史特殊講義 南洋史講讀及演習（5） 土俗學・人種學（1） 國史學（3） 東洋史學（3） 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2）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及政學科之科目中選（4）

資料來源：〈臺北帝國大學通則・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昭和三年三月十七日認可）〉，頁 47-48。

說　　明：1. 括弧內為單位數。

2. 「單位」相當於現在一門課的「門」。過去有研究認為「單位」類似現在大學的「學分」（邱景墩、陳昭如，〈戰前日本的帝國大學制度與台北帝國大學〉，頁 4），不過，根據「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原先並未規定一單元的授課時間，惟各學期開設科目及每週授業時數須於學期開始前公布；至 1931 年方規定：一授業科目以一學年每周 2 小時至 4 小時為一單位，但兩種授業科目可合為一單位。見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三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28），頁 57、《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四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29），頁 53-54、《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五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0），頁 55、《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六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1），頁 55。

3. 根據臺大圖書館藏臺北帝國大學檔案可歸納出：文政學部一單位通常每周上課 2 小時、一學年的課程，如果可拆成兩半教授（如「東洋史概說」），「前半」和「後半」則分別為 0.5 單位，應即上一學期，而非一學年。見《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編號 ntul_uh0236000_0033 至 0039。

如前所述，史學科的 3 個專攻都要修習 1 門由「土俗學・人種學」講座提供的課程。此講座的教授是移川子之藏，[77]聘有助手宮本延人

77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八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44），頁 1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01-1987），他後來升任講師、助教授；這個講座融合今日的文化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與體質人類學於一爐。[78]由於在當時文政學部，它沒有相應的學科或專攻，因此教授可以致力於研究。不過，講座可帶學生，日後成為人類學者的馬淵東一（1909-1988），就是這個講座訓練出來的；[79]他的專攻是東洋史學，1931 年 3 月畢業，是臺北帝國大學第一屆畢業生。[80]

有別於其他帝國大學，「南洋史學」是臺北帝國大學才有的史學科下的一個專攻。那麼，誰來讀呢？這是下一節的主題。

三、南洋史學專攻的學生們

南洋史學講座的教師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箭內健次都是重鎮型的學者，一生勤於著述，成果斐然。不過，評述其學術成就是一大工程，不是本文的題旨，在此只簡單介紹 3 人的研究特色，兼及他們在臺北帝大時期的研究重心。本節的重點乃在於透過臺大校史檔案勾畫南洋史專攻的學生圖景，尤其是戰爭時期鮮為人知的情況。

村上直次郎就任南洋史學講座教授已經是成熟的學者，他在臺北帝大只有 6 年多（1929 年 4 月-1935 年 9 月），於日本戰後 21 年過世，著作篇目高達 120 種，[81]研究範圍非常廣，主要是 16、17 世紀日本和西方諸國的接觸（日葡、日蘭、日英、日菲、日美關係等）、耶穌會日本傳教，以及日本南洋移民等。他在臺北帝大時期以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78 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頁 74；「附表一　講座沿革」，頁 81-84。

79 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頁 74。

80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昭和十四年十一月調〕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卒業生名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臺灣舊籍影本），頁 3-7。

81 松田吉郎、陳瑜，〈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南洋史学の成立と展開〉，收入酒井哲哉、松田利彦編，《帝国日本と植民地大学》，有「南洋史学科教員の研究業績」，村上直次郎的著作目錄見頁 261-2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VOC）的臺灣統治、原住民語言，以及日本的南洋發展為研究重點。任教臺北帝大時期不用說，在此之前或離職後，他的研究也都為日後臺灣史研究奠下了最早的根基。[82]

相對於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來臺北帝大時，學術生涯才剛起步，他在臺北帝大時期（1929 年 4 月-1945 年 11 月）主要研究南洋日本町，以及以臺灣為中心的日臺關係史，[83]著作大多發表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9 種論著之 6）。[84] 1941 年，岩生成一以《南洋日本町の研究》（1940 年 4 月出版）獲得帝國學術院賞，他在臺北帝大的研究，可說為其奠定崇高的學術地位。岩生成一於戰後返回日本，除了賡續原先的研究，另以朱印船貿易史著稱。

箭內健次在擔任南洋史學講座講師、助教授任內（1936 年 11 月-1945 年 11 月），以研究「シーボルト」，[85]以及以菲律賓為中心的日・西〔班牙〕關係史為主；戰後改以日本的鎖國和長崎為研究重心。[86]總而言之，這 3 位學者的研究，若在今天可統稱為 16、17 世紀東亞海洋史。

簡介南洋史學講座教師的研究後，來看修習南洋史學的學生。如前所述，南洋史學是隸屬文政學部史學科之下的專攻，創校第二學年度才開始授課。史學科第一年預定收 5 名學生，結果只有 2 名學生。史學科

82 關於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可參考葉碧苓，〈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7 期（2008 年 9 月，臺北），頁 1-35。

83 如岩生成一，〈長崎代官村山等安の臺灣遠征と遣明使〉與〈豊臣秀吉の臺灣招諭計畫〉，分別發表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 1 輯（1934 年 5 月，臺北），頁 283-359、第 7 輯（1942 年 8 月，臺北），頁 75-118。這兩篇文章至今仍非常值得參考。

84 岩生成一的著作目錄，共 46 種，見松田吉郎、陳瑜，〈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南洋史学の成立と展開〉，「南洋史学科教員の研究業績」，頁 271-274。

85 シーボルト是 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1796-1866）的日文寫法，中譯名為「西博爾德」，他是日耳曼醫生、博物學者，任職於長崎出島的荷蘭商館，是「出島三學者」之一。編按：西博爾德在日本自然史研究的貢獻，可參看本專號洪廣冀的論文〈拼裝的科學革命——以美國第一回達爾文爭議為中心〉第二節。

86 箭內健次著作目錄，見松田吉郎、陳瑜，〈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南洋史学の成立と展開〉，「南洋史学科教員の研究業績」，頁 276-2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收學生不足額並非臺北帝大獨有的情況，戰前的東京大學、東北帝國大學等校的史學科就學率都不高。[87]不過，在臺北帝大史學科中，南洋史學還是比其他兩個專攻（國史學、東洋史學）較受歡迎。1931 到 1943 年，史學科 33 名畢業生中，國史學專攻 8 名，東洋史學專攻 9 名，南洋史學專攻有 16 名。（見表三）這 33 名畢業生只有 2 名是臺灣人，即柯設偕（1900-1990）和張樑標。柯設偕是長老教會著名牧師馬偕（漢名偕叡理，George LeslieMacKay, 1844-1901）的外孫，他的專攻是東洋史，畢業論文題目是〈台灣の名稱の歷史的並に地理的考察及び古代漢民族の台灣に關する智識の變遷〉（〈臺灣之名稱的歷史與地理考察以及古代漢民族關於臺灣之知識的變遷〉），[88]若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屬於臺灣史。張樑標的專攻是南洋史，畢業論文探討中國和南洋的關係（題目詳下），[89]今日大概可以算作海洋史的研究範疇。

臺北帝大修習年限是 3 至 6 年，[90]第一屆畢業生在 1931（昭和六）年 3 月畢業。那一屆文政學部下分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及政學科，共有 14 名畢業生，史學科只有 2 名，即前述柯設偕與馬淵東一，兩人的專攻都是東洋史學。1932 年第二屆文政學部有 34 名畢業生，史學科 6 名，其中國史學專攻 2 名，東洋史專攻 4 名。要到 1933 年第三屆才有南洋史專攻的畢業生，那一屆文政學部有 31 名畢業生，史學科 4 名，含東洋史專攻 1 名（佐渡理三郎），南洋史專攻 3 名，即張樑標、淵脇英雄以及山村光敏。[91]總之，歷屆史學科畢業生不多，通常 1 至 3 名左右，

87 根據岩生成一的回憶，見葉碧苓，〈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比較（1926-1945）〉，頁 111。

88 葉碧苓，〈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比較（1926-1945）〉，頁 112-113、124。柯設偕畢業論文題目，見《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編號 ntul_uh0218001_0006。

89 葉碧苓，〈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比較（1926-1945）〉，頁 113、124。

90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三年》，頁 46。

91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昭和十四年十一月調〕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卒業生名簿》，頁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有完全沒有畢業生的情況。詳見表三。

表三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畢業生名單（1931-1943）

畢業年月	氏　　名	本　　籍	專　　攻
1931（昭和六）年 3 月（第一回）	柯設偕	臺北	東洋史
	馬淵東一	長崎	東洋史
1932 年 3 月（第二回）	中治赳夫	兵庫	國　史
	大山綱武	鹿兒島	國　史
	波田野丈夫	鳥取	東洋史
	古屋次雄	大分	東洋史
	松本盛長	東京	東洋史
	鈴木謹一	靜岡	東洋史
1933 年 3 月（第三回）	淵脇英雄	熊本	南洋史
	佐渡理三郎✕	富山	東洋史
	張樑標	臺中	南洋史
	山村光敏☆	愛知	南洋史
1934 年 3 月（第四回）	齋藤知太郎	岡山	國　史
	鄉原正雄	島根	南洋史
1935 年 3 月（第五回）	原徹郎	埼玉	東洋史
	速水家彥	東京	南洋史
	中村孝志	福島	南洋史
1936 年 3 月（第六回）	無		
1937 年 3 月（第七回）	齋藤悌亮☆	千葉	南洋史
	鈴木猛雄☆	山形	國　史*
1938 年 3 月（第八回）	少名子正義	大分	南洋史
1939 年 3 月（第九回）	中澤孝一郎	群馬	國　史
1940 年 3 月（第十回）	江本傳	德島	南洋史
1941 年 3 月(第十一回)	當麻義春✕	埼玉	南洋史
1941 年 12 月(第十二回)	高添多喜男	佐賀	國　史
	高索辰正	福島	東洋史
	松茂良興則	沖繩	國　史
1942 年 9 月(第十三回)	井上須已次	神奈川	國　史
	長岡新治郎	大阪	南洋史
	坂野鎮雄	愛知	南洋史
	山中正	宮城	南洋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畢業年月	氏　　名	本　　籍	專　　攻
1943 年 9 月（第十四回）	兒玉太刀男	鹿兒島	南洋史
	田中則雄	山口	南洋史
	富名腰尚武	沖繩	南洋史

資料來源：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昭和十四年十一月調〕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卒業生名簿》，頁 10-19；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六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41），頁 268、《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七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43），頁 292-294、《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八年》，頁 293-295。《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_uh022005_0002、ntul_uh0222007_0001、ntul_uh0222008_0001、ntul_uh0222009_0001、ntul_uh0222010_0001 至 0002、ntul_uh0222011_0004、ntul_uh0222011_0010、ntul_uh0222011_0012、ntul_uh0218013_0004。

說　　明：1.「☆」表入營或應召；「×」表死亡（以 1941 年為時點）。
2. *鈴木猛雄於 1934 年入學，原為東洋史專攻，1935 年轉至國史專攻。

當年這些學生的畢業論文（卒業論文），有若干題目今天看來仍然是臺灣史領域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的。茲根據臺大校史檔案，將 1933-1943 年南洋史專攻的畢業論文題目羅列於下，共 15 篇：

1. 張樑標　〈第十六七世紀に於ける南支と南洋の史的関係とフィリッピンとの交涉〉（十六、十七世紀南中國與南洋之歷史關係及與菲律賓之交涉）
2. 淵脇英雄　〈占領初期に於けるイスパニヤの比島統治〉（佔領初期西班牙的菲律賓統治）
3. 山村光敏　〈十七世紀に於ける台湾経由の南洋貿易〉（十七世紀經由臺灣的南洋貿易）
4. 鄉原正雄　〈拾六七世紀に於ける呂宋島の日本人〉（十六、七世紀呂宋島的日本人）
5. 速水家彥　〈鄭成功の台湾攻略と其後の対和蘭人交涉〉（鄭成功的臺灣攻略及其後與荷蘭人的交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 中村孝志　〈台湾に於ける西、蘭両国人の教化事業〉
（西班牙、荷蘭兩國人在臺灣的教化事業）
7. 齋藤悌亮　〈鄭成功の台湾攻略〉（鄭成功的臺灣攻略）
8. 少名子正義　〈比律賓に於ける基督教の伝道事業について〉
（關於菲律賓的基督教傳道事業）
9. 江本傳　〈十六・七世紀を中心としたヒリツピンに於ける「トリビウト」に就いて〉
（關於十六、七世紀在菲律賓的「貢納」）
10. 當麻義春　〈フィリッピン革命発生の諸原因に就て〉
（菲律賓革命發生之諸原因）
11. 坂野鎮雄　〈蘇祿國研究—特にその対外関係を中心として—〉
（蘇祿國研究：特別以其對外關係為中心）
12.長岡新治郎　〈十七世紀に於ける爪哇米〉
（十七世紀的爪哇米）
13.山中正　〈十七世紀に於けるバンタム〉
（十七世紀的萬丹）
14.田中則雄　〈東印度會社の爪哇に於ける貢納制度について〉
（東印度公司在爪哇的貢納制度）
15.兒玉太刀男　〈十六・十七世紀に於ケル、マニラの対マカオ交涉〉
（十六、十七世紀馬尼拉對澳門之交涉）[92]

92 以上整理自《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_uh0218003_0006、0008、0010、0015；ntul_uh0218004_0003；ntul_uh0218005_0009；ntul_uh0218006_0001；ntul_uh0218008_0001；ntul_uh0218010_0004；ntul_uh0218011_0003；ntul_uh0218013_0012、0015、0017；ntul_uh0218014_0005、0006。畢業論文標號 9 題目中的「トリビウト」是歷史假名，現在拼為「トリビュウト」，應係英文「tribute」的日文音譯，於此譯為「貢納」，作為納貢的名詞，確否待考。標號 11 的「蘇祿國」（Saltanah Sulu），古伊斯蘭國，約位於今菲律賓民答那峨島西邊的群島及婆羅洲北部。標號 13 的「バンタム」是「バンテン」的舊稱，即 Banten，16 世紀有盛極一時的伊斯蘭 Banten 王國，位於爪哇島最西部，今為印尼萬丹省。葉碧苓，〈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比較（1926-1945）〉，頁 124，表五：1931-1942 年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畢業生一覽表，收有前 10 篇畢業論文，惟題目有脫漏之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些由大學生撰寫的學士論文，內容可能還很粗淺，不過就課題來說，大部分屬於今天臺灣學界所稱的海洋史範疇；多篇分別以以菲律賓、呂宋、蘇祿國、爪哇、萬丹等為研究對象，算是東南亞史的題目，都在南洋史學講座教師的研究範圍內。臺灣在戰後，歷史教育和史學研究的轉折很大，直到 1990 年代才開始有變化，7、80 年前的論文題目，今日觀之仍顯得新鮮，令人有難望其項背之感。何以如此，本文將在第四節說明。

根據〈臺大圖書館校史資料　臺北帝國大學卒業論文〉目錄，以上畢業論文有 3 本（上述編號 4、7、8）藏於臺大圖書館，[93]筆者親眼看到鄉原正雄的畢業論文〈拾六七世紀に於ける呂宋島の日本人〉，[94]厚厚一大本，令人印象深刻。精裝本的封面和封底蛀朽得很嚴重，不過手寫的稿紙狀況還好。他使用的稿紙是一張兩面，每面 240 格（12×20），這本論文共 194 張（當時的「頁」），稿紙算法 93,120 字，[95]約 93,000 字。由於裝訂已散開來，筆者不敢逐頁翻閱，稍微瀏覽章後註釋，發現主要是利用英文論著，也有西班牙文文獻。另外 2 篇論文有電子掃描檔，也都寫在稿紙上，齋藤悌亮的〈鄭成功の台湾攻略〉約 10 萬字，[96]少名子正義的〈比律賓に於ける基督教の伝道事業について〉約 98,000 字。[97]就參考文獻來說，雖然還未能真正利用荷蘭文或西班牙文，但前者引用

93 見〈臺大圖書館校史資料　臺北帝國大學卒業論文〉目錄，http://web.lib.ntu.edu.tw/speccoll/node/144（2017 年 9 月 5 日檢索）。

94 鄉原正雄，〈拾六七世紀に於ける呂宋島の日本人〉（手稿本）（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藏），編號(T)731.26 2771，條碼 2240702。

95 現在年輕學子大概很難理解用稿紙手寫文章的情況了。稿紙時代的字數，不管空行、空格，是以一張多少格來算字數，稿費的計算亦然。

96 稿紙算法 105,560 字。這篇論文寫在一張兩面、每面 260 格／字（13×20）的稿紙上，正文 203 張稿紙，含封面封底共 214 張。〈臺大圖書館校史資料　臺北帝國大學卒業論文〉，檔案編號 ntul_uh2240815。

97 稿紙算法 97,800 字。這篇寫在一張兩面、每面 200 格（10×20）的稿子上，內文未標頁碼，共 489 面，含封面封底共 493 面。〈臺大圖書館校史資料　臺北帝國大學卒業論文〉，檔案編號 ntul-22407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文原始文獻，後者用了英文論著，以大學生來說，十分難得。

南洋史學專攻的學生要研究上述 16、17 世紀東亞海洋史或菲律賓歷史，必須具備日文以外的語文訓練。如前言引述中村孝志的回憶，他們在高等學校時期就修習英語和德語，文政學部兩年必修法語，專攻南洋史學的學生更進一步被要求修習西班牙語及荷蘭語。[98]為了訓練學生必要的語言能力，南洋史學講座的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箭內健次都開設過語言課。根據葉碧苓整理的「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相關課程一覽表」，1929 年至 1941 年間，除了 1929、1936、1939、1940 四年之外，南洋史學每年都提供語言課程，早年由村上直次郎授課，他在 1930、1931 年教授西班牙語和荷蘭語，1932 年教授西班牙語，1933 年改由岩生成一教授荷蘭語，1934 年由村上直次郎教授西班牙語，1935 年之後由岩生成一負責教授荷蘭語，箭內健次在 1938 年教授過西班牙語。村上直次郎教授的課名是「西班牙語」、「西班牙語初步」、「和蘭語」，以及「和蘭語初步」。[99]

以今天的角度來看，很難想像講座教授在教大學部學生外國語，甚至是最初階的課。當然這和當時大學部學生必須撰寫畢業論文的規定息息相關。南洋史學的研究範圍很廣，簡單來講就是臺灣加上現在的東南亞地區，大抵修習西班牙語的學生選擇以菲律賓、修習荷蘭文的學生以荷蘭東印度公司作為畢業論文的題目。[100]由於必須花時間學習新語言，才能寫出像樣的畢業論文，中村孝志說，南洋史學的學生「花費四年畢業乃至於五年的人，大概約占一半」，[101]是言過其實了。以撰寫畢業論文的 15 位畢業生而言，只有 3 名是 4 年畢業，3 年畢業的共 7 名，1942 年和 1943 年畢業的 5 名，兩年半就畢業了，不過那是因為戰爭的關係。[102]

這些南洋史學專攻的學生，修課情況如何？畢業後往哪裡去？本文

98 中村孝志撰，陳俐甫譯，〈臺北帝國大學的日子〉，頁 178。

99 葉碧苓，〈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比較（1926-1945）〉，頁 119-120。

100 中村孝志撰，陳俐甫譯，〈臺北帝國大學的日子〉，頁 178。

101 中村孝志撰，陳俐甫譯，〈臺北帝國大學的日子〉，頁 178。

102 《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同註 92 所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無意做同學錄般全面的調查和整理，而是想利用臺大圖書館藏的文學部史學科珍貴文書／檔案，來賦予南洋史學這個專攻「血肉」，也就是在架構的呈現之外，放上個人的案例，將過往的歷史帶回現場。由於這些文書／檔案本身並無系統，顯得很零星，無法做系統的研究，但筆者相信，透過個案，我們會更有臨場感。

首先，筆者選取中村孝志和張美惠（1924-2008）為例，兩人都是南洋史專攻的學生。中村孝志在戰後成為研究荷蘭時期臺灣史的重要學者，張美惠在戰後的國立臺灣大學畢業，並擔任助教，有一段曲折的人生路程。除了這兩人之外，在可能的範圍內，雖然無法求全，我會盡量帶入其他學生的情況。

中村孝志是所謂的「灣生」，1910 年生於屏東恆春，本籍福島縣，在進入臺北帝大之前，依序就讀新竹高等小學校、臺北第一中學校、臺北高等學校。[103]在臺大圖書館所藏校史檔案中，可以看到他修課的情況。他在 1932（昭和七）年 4 月入學，1935 年 3 月 15 日通過畢業論文，[104]前後費時 3 年，沒有因語言的問題而多花時間。他在前 2 年共修了 26 門課，獲得 25 單位（其中兩門各 0.5 單位），第 3 年修了 2 門課，成績單上沒註明單位數，[105]是否為無學分課程，無法確知。史學科共通必修科目 7 單位，南洋史專攻必修科目 13 單位，共 20 單位。（見附表一）從中村孝志的成績單可知，他在大學前 2 年全力修課，第 3 年致力於撰寫畢業論文。他修過的課，在南洋史方面，有 5 門村上直次郎、3 門岩生成一的課；也修了國史、東洋史、西洋史方面的課，以及土俗學・人種學、地理學、教育史的課，同時修了 2 年法語（佛語）。

南洋史學專攻的學生畢業後有何選擇？根據現存檔案「卒業豫定学

103 參考黑羽夏彥，〈中村孝志著作目錄〉，《ふぉるもさん・ぷろむなあど》部落格，2016 年 3 月 5 日，http://formosanpromenade.blog.jp/archives/55993247.html（2018 年 2 月 7 日檢索）；鍾淑敏、許賢瑤，〈中村孝志教授と台湾史研究（完全版）〉，《天理臺灣學報》第 26 號（2017 年 7 月，奈良），頁 17。

104 《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uh0218005_0009。

105 《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uh0218005_00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名簿竝就職希望調」，臺北帝大在學生預定畢業之前會調查就職願望。調查表區分為「就職希望」之「有」、「無」，勾選「無」的學生不用繼續填；勾選「有」的學生，則須在「要件」旁邊的空白處註明「希望」的類別。（參見圖四）類別在「備考」中：

備考：就職希望要件，大凡分為左記（下記）項目，記入為荷

官　廳

總督府何局

地方州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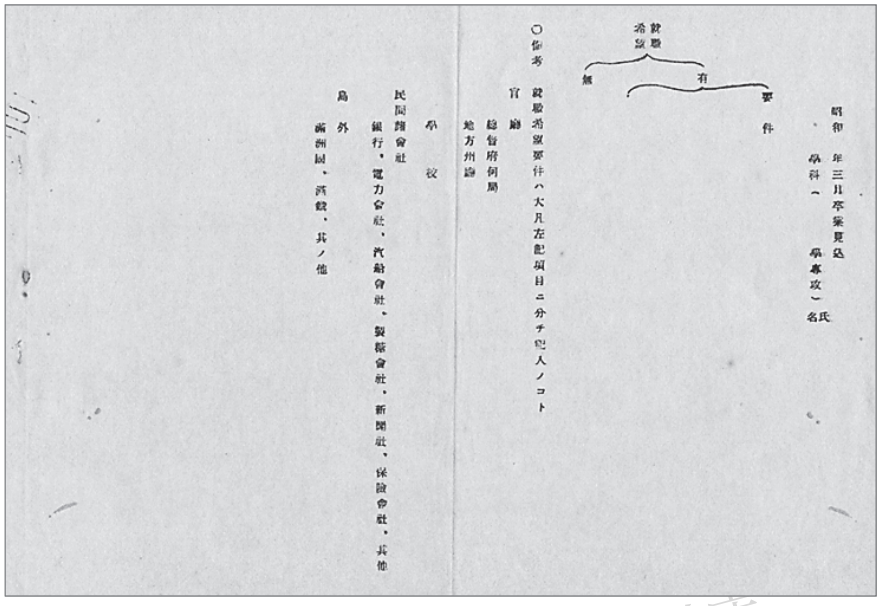
學　　校

民間諸會社

銀行、電力會社、汽船會社、製糖會社、新聞社、保險會社、其他

島　外

滿洲國、滿鐵、其他



圖四　「就職希望調」書

資料來源：《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uh0201002_00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筆者看到 5 份「就職希望調」，茲依畢業先後，將調查結果列如表四；並附上這 5 人 1939 年的工作單位，以茲對照。

表四　五位南洋史學專攻畢業生就職狀況（1934-1938）

姓　名	鄉原正雄	速水家彥	中村孝志	齋藤悌亮	少名子正義
畢業年月	1934 年 3 月	1935 年 3 月	1935 年 3 月	1937 年 3 月	1938 年 3 月
畢業前就職希望	就職希望要件 一、史學關係官廳（例如調查課編修課圖書館等） 二、因為是高商出身，銀行、會社也可以	無	要件 學校職員	要件 官立學校教員	無 （理由） 天理教本部之就職已決定
1939 年工作單位	臺中工業學校	總督官房 外務部	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	私立臺北國民中學校	天理圖書館

資料來源：《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uh0201001_0003、ntul-uh0201002_0011、ntul-uh0201002_0012、ntul-uh0201004_0013、ntul-uh 0201005_0004；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昭和十四年十一月調〕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卒業生名簿》，頁 10、12、15、17。

這 5 位畢業生，有 2 位的「就職希望」填「無」，其中 1 位理由是已經有工作，其他 3 位各有所希望的去處。觀察他們在 1939 年的工作，有填「就職希望」的鄉原正雄，不是從事畢業前期待的工作；齋藤悌亮想到官立學校教書，結果在私立學校工作。至於填「學校職員」的中村孝志，其實是有如願的，他在畢業後留在臺北帝國大學，擔任 1935 年甫設立的「臺灣史料調查室」副手，1939 年 7 月才離開臺灣到東京，擔任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調查員。[106]

同樣專攻南洋史學的張樑標、淵脇英雄與山村光敏，都在 1933 年 3 月畢業，比鄉原正雄早，他們在 1939 年分別就職於：南支派遣軍調查班、

106 鍾淑敏、許賢瑤，〈中村孝志教授と台湾史研究（完全版）〉，頁 17-18。中村孝志於 1945 年 12 月任天理語學專門學校教授，1949 年天理大學設立後，擔任該校教授。其間曾任攝南大學教授，1986 年返回天理大學，直到逝世前都在該校教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市立臺北家政女學校、新竹中學校。[107]張樑標的工作算是和所學有直接關係，不過因為看不到他們的「就職希望」，無法知道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

對於即將畢業的學生，文政學部會提供就業推薦書（推薦信），學生可申請取得。這類推薦書大致有一定的寫法。1934 年 3 月畢業的鄉原正雄的推薦書，除了載明出身島根縣、姓名、出生年月日外，主要內容如下：

> 一、右者之人物、性行，有如左記。懇請以特別之貴審議，希冀惠予採用。嵛此致上推薦。（按，「人物」等同中文的個性、性格）
>
> 一、人物　溫良而真摯
>
> 二、性行　性質溫和、品行方正
>
> 思想穩健[108]

中村孝志有兩份推薦書，一份是他預定畢業之前，1935（昭和十）年 1 月 10 日大井「主任受領立案」的，算是草稿階段，內容如下：

> 昭和十年三月本學部史學科預定畢業之中村孝志，有學業成績佳良、品行方正、思想穩健、性質溫順、身體健全而有運動競技之興趣且特長於籠球者，畢業後希望至貴管下就職，是以，懇請以特別之貴審議，希冀惠予採用。茲附上履歷書、寫真、成績證明書，嵛此請求也。[109]

這份推薦書是否有助於中村孝志取得他畢業後第一份工作（「臺灣史料調查室」副手），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推薦書中特地提到他有運動方面的興趣，善於打籃球。[110]

---

107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昭和十四年十一月調〕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卒業生名簿》，頁 7。

108 中文係作者所譯。《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utl_uh 0237004_0002。

109 中文係作者所譯。《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utl_uh 0237005_0003。

110 「籠球」（ろうきゅう）即中文的籃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37（昭和十二）年 12 月 16 日，中村孝志申請第二份推薦書，內容與鄉原正雄的很像，只是加了一個「其他」：

一、人物　溫和而真摯、勤勉而熱心

一、性行　性質溫順、品行方正、思想穩健

一、其他　善於籠球[111]

我們不知道中村孝志為何在當年底向文政學部申請推薦書，他在 1939 年 7 月才轉任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或許這期間他有試著申請別的工作，但沒成功。

這些早期畢業的南洋史學的學生，相關資訊較多，1940 年代入學的學生，可能戰爭結束時文書還沒歸檔，留下的材料較少。南洋史專攻的學生到戰爭結束前有多少位，並不清楚。葉碧苓指出，根據田中則雄（1943 年畢業）的回憶，與他同為南洋史學專攻的畢業生還有：青野晃、西村兵部（1920-1976）、樋田（口）豐、星出幸雄、長岡新治郎、阪（坂）野鎮雄、山中正、兒玉太刀男、富名腰尚武、藤原正義等人，連他共 11 名。[112]和前述 1942 年 3 月以前畢業的 10 名合計，共 21 名。不過這份名單可能有問題，不是每個人都畢業；以在學學生來說，名單也不完整。根據《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八年》，長岡新治郎、坂野鎮雄、山中正等 3 人於 1942 年 9 月畢業；兒玉太刀男、田中則雄、富名腰尚武等 3 人於 1943 年 9 月畢業（見表三）。[113]其餘 5 人的情況比較複雜，容後細述。附帶一提，戰爭期間大學、專門學校等修業年限在 1941 年縮短 3 個月，1942 年豫科和高等學校又縮短 6 個月，[114]因此臺北帝大的畢業月份自 1941 年起，從原有的 3 月變成 9 月、12 月都可以畢業。

111 中文係作者所譯。《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utl_uh 0237005_0004。

112 葉碧苓，〈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比較（1926-1945）〉，頁 111-112。葉文「樋田豐」應為「樋口豐」、「阪野鎮雄」應為「坂野鎮雄」之誤。

113 見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八年》，頁 295。

114 永原慶二監修，石上英一等編輯，《岩波日本史辭典》（東京：岩波書店，1999），頁 2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專攻南洋史學的學生，因故肄業，或因戰爭結束臺北帝國大學解散而無法畢業的人數，不易估算。根據臺大校史檔案的「學生成績卡」，可以整理出在 1941 年日本進入「大東亞戰爭」後入學的學生名單（表五），他們的際遇非常具體地反映了時代。

表五　1942-1945 年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南洋史學專攻入學名單

入學時間	姓　名	成績單注記	入營時間
1942（昭和十七）年 4 月	青野晃	1944 年 9 月學士試驗合格	1944 年 3 月 15 日
	樋口豐	1943 年 11 月 10 日假卒業（臨時畢業）[115]	1943 年 12 月 1 日
	星出幸雄	1943 年 11 月 10 日假卒業（臨時畢業） 1944 年 9 月學士試驗合格	1943 年 12 月 1 日
	溝淵正大	無特別註明	
	西村兵部	1944 年 10 月 1 日至 1945 年 9 月休學（生病）	
1942 年 10 月 10 日	宮永又郎	無特別註明	
1943（昭和十八）年 10 月 1 日	稻墻正治		1943 年 12 月 1 日
	岩村光介		1943 年 12 月 1 日
	重田次男	1944 年 4 月至 9 月休學(生病)	
	藤原正義		1943 年 12 月 1 日
	森牧夫		1943 年 12 月 1 日
1944（昭和十九）年 10 月 1 日	居川洋三		
	川久保元		
	河田文稔		
	中川成夫		
	長谷川ミ/ユ 張美惠[116]		
	濱田忠雄		

115 日本戰爭末期為了因應很多學生必須入營入團而制訂的規定，可以先授與學生「假卒業」資格，即臨時畢業之意。

116 按，日本姓名上輕畫斜線，上加原姓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入學時間	姓　名	成績單注記	入營時間
1945（昭和二十）年4月1日	猪股崇		
	館野實		
	藤原保		
	葉子謀		
	横井三郎		

資料來源：1. 1942 年名單見《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uh0218015_0010 至 0014、ntul-uh0218016_0018。宮永又郎另見同一檔案〈自昭和十七年十月至十八年九月學修科目屆〉，編號 ntul-uh0207002_0021。

2. 1943 年名單見《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uh0218017_0011 至 0015。

3. 1944 年名單見《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uh0218018_0012 至 0017。河田文稔後來轉到政學部，見編號 ntul-uh0207004_0019。

4. 1945 年名單見《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uh0218019_0005 至 0009。

以上名單和資料整理自「學生成績卡」。既然名為成績卡，自然要有成績，但從稻壩正治（含）以下，成績單都是空白的。因為這 5 位學生 1943（昭和十八）年 10 月 1 日入學，同年 12 月 1 日就入營了。1944 年 10 月 1 日入學的 6 位學生，除了女學生長谷川ミヱ（張美惠）外，成績欄全部空白，也未登錄入營與否的訊息。1945 年 4 月入學的 5 名學生的成績欄也都空白。

日本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偷襲美國珍珠港，引發太平洋戰爭——日方正式稱為「大東亞戰爭」。戰況越來越吃緊，日本兵力不足，原本高等教育機關（大學、高等學校、專門學校）在籍學生有「徵兵猶豫」（延期入營）的優待，可以延到 26 歲；1943 年 10 月東條〔英機〕內閣〔以敕令〕局部取消「徵兵猶豫」，20 歲以上的文科（加上部分理科學部）學生，徵兵檢查合格者，必須於該年 12 月入營，史稱「學徒出陣」。[117]

117 永原慶二監修，石上英一等編輯，《岩波日本史辭典》，頁 2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就是這些南洋史學專攻的男學生成績卡注明「昭和十八（1943）年十二月一日入營」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臺北帝國大學豫科於 1941 年 4 月 1 日成立，[118] 1943 年入學的學生幾乎都是豫科畢業生。上列名單中，除了張美惠外，皆自臺北帝國大學豫科畢業，而且只有她和葉子謀是臺灣人，其餘都是日本人。

戰爭的影響是非常具體的，1942（昭和十七）年 4 月入學的青野晃，在 1944 年 3 月 15 日入營，於同年 9 月「學士試驗合格」，即取得學士學位；但是他的成績卡「〔學士〕論文題目」那一欄完全空白，其後的成績卡都是如此，可見學生不再需要撰寫學士論文。另外，同樣是 1942 年 4 月入學的樋口豐、星出幸雄，在隔年 11 月 10 日「假卒業」（臨時畢業），12 月 1 入營。他們都有課業成績，其中星出幸雄的成績卡注明「學士試驗合格」，樋口豐則無。他們算是有修到課，而 1943 年 10 月 1 日入學的學生，2 個月後就入營了，在學時間極短。雖然在學術論文上不宜流露個人的心情，筆者還是忍不住替他們感到可惜，才當 2 個月臺北帝大學生，就必須離開學校，面對戰爭的殘酷，不少學徒無法生還。

1944（昭和十九）年入學的 6 位學生當中，張美惠在臺北帝大被接收後，繼續留下來；學制更改後，她變成三年級學生，於 1947 年畢業，留校擔任助教。她是國立臺灣大學第一位歷史系畢業生，也是第一屆文學院唯一的畢業生。[119]如果說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南洋史學在戰後有「具體的過渡」，那麼她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值得特別花篇幅加以介紹。

---

118 設置臺北帝國大學預科主要原因在於：臺北高等學校畢業生就讀臺北帝大的人數遠不如理想，大半到日本內地帝國大學或私立大學入學；為確保入學人數，仿照北海道帝國大學之例，在臺北帝國大學設立預科，以養成該大學之新生，預科學生數以臺北帝國大學新生名額約 6 成為基準。見松本巍撰，蒯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頁 33。

119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 59；許雪姬、張隆志、陳翠蓮訪談，賴永祥、鄭麗榕、吳美慧、蔡說麗紀錄，《坐擁書城：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7），頁 2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這裡，我們只講張美惠成為南洋史學專攻學生的經過，戰後她的經歷留到下一節討論。首先交代臺北帝國大學首收女學生入學的情況。如前所述，臺北帝大所收學生中，高等學校畢業生相對少，還有個「異例女性學生入學者」，即 1931（昭和六）年文政學部第二次考試及格入學者 2 名，其中 1 名是京都同志社女子專門學校畢業生大森政壽。松本巍在《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說，當時日本尚未公布大學男女同校制度，所以成為報紙上的話題。[120]不過，在此之前，東北帝國大學、北海道帝國大學以及九州大學皆有收女生，但人數非常少。[121]臺北帝國大學從 1928 到 1945 年共有 9 位女學生正式入學；另有 16 名「聽講生」[122]、4 名選科生。9 位本科生中有 3 位是臺灣人：林素琴（西洋哲學）、張美惠（南洋史學）、曾氏麗珍（植物學科），都是 1944 年入學。[123]一般常會提到的杜淑純（時名杜純子，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1893-1986〕的女兒）是選科生，不是本科生，在籍期間為 1942 年 4 月到 1944 年 9 月。[124]

另外，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林素琴，她是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理論大師林呈祿（1886-1968）的女兒，也是臺灣第一位就讀哲學的女學生。她入學時用的姓名是「林こずゑ」，1943 年先以選科生入學，第二年成為本科生。她以哲學科西洋哲學為專攻，原籍注明新竹，出身學校東京

120 松本巍撰，蒲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頁 22。

121 嘉義出身、著名的女性黨外人士許世賢博士，就是在 1939 年取得九州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122 根據廖述英的整理，「聽講生」即對學部中某些科目有聽講意願者，可向學部提出申請，而學部長在認定申請者不會妨害正常上課，並在總長（即校長）的許可下，可同意讓其以「聽講生」名義進入課堂聽講，但不能參加修習科目的考試，而聽講期限為一學期或一學年。廖述英，〈臺北帝大總共收過多少個女學生？〉。「選科生」之說明見註 67。

123 廖述英，〈臺北帝大總共收過多少個女學生？〉。

124 廖述英，〈臺北帝大總共收過多少個女學生？〉。1940-1944（昭和十五至十八）年 11 月文政學部錄取 6 位「選科生」，含杜純子，見《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昭和十九年度學生名簿」，編號 ntul-uh0203001_00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女子大學高等學部，[125] 1945 年 11 月自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畢業。[126] 近年來臺灣本土哲學受到學界重視，連帶地研讀哲學的女性也受到注目，林素琴的名字和著作遂得以在論文集中出現，但只佔一個欄位的小小空間。[127]

專攻南洋史學的張美惠，父親張文伴（1898-?）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生，在大稻埕開業。[128]張家是天主教家庭，在 1942 年 5 月 1 日改姓名，張美惠改名長谷川ミヱ，弟弟張寬敏（1926-2014）改名長谷川博重，兩人同年（1944）進入臺北帝國大學就讀，張寬敏是醫學部學生。[129] 奇特的是，張美惠進入臺北帝大後似乎就用原名，原因不明。她的本籍是臺北州基隆郡瑞芳街（街下省略），申請臺北帝大時是聖心女子學院專門學校歷史科第三學年的學生，預定 1944（昭和十九）年 9 月畢業。在文政學部檔案的「昭和十九年度入學願書」（入學申請書）中，可以看到長谷川ミヱ申請入學的推薦狀（推薦信）及相關資料。推薦信由聖

125 《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uh0218017_0087。

126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檔案，「國立臺灣大學教員履歷表」073（林素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資料室藏），學歷「修業年數」填寫：3 年，「修業起迄時期」填寫：「自民國三十二年十月至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據此只有 2 年 1 個月，不過，這時大學修業年限已因戰爭縮短半年，2 年半即可畢業，臺灣戰後情況混亂，可能進一步從寬認定。

127 洪子偉主編，《存在交涉：日治時期的臺灣哲學》（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6），頁 33。根據洪子偉的表格，林素琴專長領域「法國哲學、大陸理性論」，1946-1955 年在臺灣大學哲學系擔任助教；1953 年發表〈迪卡特哲學的方法〉。在洪子偉文中，林素琴生年為 1924 年，惟根據臺大校史檔案，林應生於 1923 年 11 月 22 日；《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uh0218017_0087，以及國立臺灣大學人事檔案之「國立臺灣大學教員履歷表」073（林素琴），出生年月日一致，皆為「民國 12 年 11 月 22 日」。

128 所澤潤，〈台湾人女子最初の帝大生——長谷川みヱと張美惠〉，《段丘》第 19 號（2015 年 9 月，東京），頁 47-48。

129 所澤潤（採訪紀錄、解說、註解）、張寬敏（口述），〈聴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II）台北一師附小、台北高校、台北帝大医学部を経て、台湾大学医学部卒業〉，《群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人文・社会科学編》第 44 巻（1995 年 3 月，群馬），頁 1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心女子學院專門學校校長吉川茂仁香（1906-1970）撰寫，收信人是臺北帝國大學總長安藤正次（1878-1952）。推薦信的內容很簡單：「右者擬入學貴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由於具有充分學業、得完成貴學學生之名之本分者，茲推薦也。」日期是 1944 年 6 月 21 日。同一檔案包括「身體檢查表」、「成績證明書」，以及吉川校長署名和簽章的「調查書」，內容翔實，從中可知長谷川ミヱ的成績幾乎都是「優」（按，當時成績分優、良、可三等級）。[130]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學部內之學科志願順位」一欄，有 10 格，長谷川ミヱ填了 3 個志願：1 南洋史學科、2 國史學科、3 東洋史學科。[131]也就是說，長谷川ミヱ申請進史學科，最想讀的是南洋史學。在口述訪談紀錄中，張美惠提及她的課堂報告曾引用岩生成一的論文，聖心女子學院老師海老澤有道（1910-1992）遂鼓勵她申請臺北帝大。[132]

對於選擇申請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專攻這件事，張美惠在一篇替金關丈夫（1897-1983）辯解的文章中有進一步說明。張美惠在聖心女子學院讀書時，就投稿《民俗臺灣》，1942 年 4 月號起，發表〈臺灣の家庭生活〉（上、中、下），[133]其後又發表〈祖母の死をめぐつて〉（〈回顧祖母之死〉），[134]並在「點心」專欄有則小文，回應國分直一（1908-2005）的文章〈沈鐘〉，提示天主教臺灣傳教相關的材料。[135]〈臺灣の家庭生

130 《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昭和十九年度入學願書文政學部教務係」，編號 ntul-uh0209000_0044 至 0046。

131 《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昭和十九年度入學願書文政學部教務係」，編號 ntul-uh0209000_0043。

132 所澤潤，〈台湾人女子最初の帝大生〉，頁 51。

133 長谷川美惠，〈臺灣の家庭生活〉（上、中、下），《民俗臺灣》第 2 卷第 4 號（1942 年 4 月，臺北），頁 16-21、第 2 卷第 5 號（1942 年 5 月），頁 12-15、第 2 卷第 6 號（1942 年 6 月），頁 25-27。

134 長谷川美惠，〈祖母の死をめぐつて〉，《民俗臺灣》第 2 卷第 12 號（1942 年 12 月，臺北），頁 34-35。

135 長谷川美惠，「點心」（無篇名），《民俗臺灣》第 3 卷第 3 號（1943 年 3 月，臺北），頁 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活〉一文獲得《民俗臺灣》創辦人之一臺北帝大醫學部解剖學教授金關丈夫的賞識。我們可以推想，在那個時代能寫文章的女性非常少，何況又是具有學術意味的文章。那年（1942）暑假張美惠回臺省親，金關丈夫和編輯同仁設宴款待，讓她受寵若驚，其後金關教授若到東京，會和她聯絡，邀她一起看展覽，非常器重她。當她考慮就讀大學時，金關教授建議她申請自己的母校京都帝國大學，但當時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都不收女生。由於她對近世初期日本對外關係史和東亞交涉史有興趣，決定申請甫獲帝國學士院賞的岩生成一所主持的臺北帝大南洋史學專攻。[136]

南洋史學是文政學部史學科 3 個專攻中最受歡迎的，從資料可以得知，1942（昭和十七）年（含）以後，此專攻的學生通常占史學科學生一半以上：1942 年 4 月入學者，占 5 / 9；同年 10 月入學者，占 1 / 3；1943 年 10 月入學者，占 5 / 8；1944 年 10 月入學者，占 6 / 10；1945 年 4 月入學者，占 5 / 8。[137]不過，到了戰爭期間，學校已很難正常上課，男學生幾乎都入營，可以想像張美惠上課時的寂寥情況。[138] 1945 年 3 月臺北帝大「閉校」，她也被「野放」，必須有地方掛「籍」（按，有地方工作），由於赤十字病院院長堀內次雄（1873-1955）是她父親就讀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時的老師，她遂得以到該病院從事醫療事務。[139]

戰爭對臺灣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臺北帝國大學無法置身事外；戰後的變局更是巨大、超乎想像。

136 張美惠，〈金関丈夫氏と『民俗台湾』と台北帝大と〉，《日本歷史》第 595 號（1997 年 12 月，東京），頁 62-63。

137 見〈臺大圖書館校史資料　臺北帝國大學卒業論文〉目錄。

138 張美惠是 1944（昭和十九）年 10 月 1 日同時入學的 6 位南洋史專攻學生中成績卡上唯一有成績的，她修了 16 門課，包括佛語（法語）課，都是必修課。見《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學生成績卡」，編號 ntul-uh0218018_0016。

139 所澤潤（採訪紀錄、解說、註解）、張寬敏（口述），〈聽取り調査〉，頁 1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張美惠、陳荊和：承先未能啟後

上一節介紹南洋史學專攻的學生們，這是以這個專攻為主軸的微觀視野，可能失之孤立，遠離大脈絡。實則從 1928 到 1945 年，臺北帝國大學有非常大的發展和擴充，中村孝志和張美惠入學時的臺北帝大是非常不一樣的。在此，僅能概略地描述臺北帝大在這 17 年內的變化。

臺北帝大創建時只有兩個學部，即文政學部和理農學部。1936 年以臺北醫學專門學校和臺北醫院為基礎，增設醫學部；1939 年增設附屬熱帶醫學研究所；1942 年將理農學部析為理學部和農學部；1943 年增設工學部，同年又設置南方人文研究所與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前者以文政學部學者為中心，後者以農學部和理學部學者為中心。至 1944 年，臺北帝大共有文政、理、農、醫、工 5 學部，講座數分別為：25、13、22、24、30，共 114 個講座；5 學部之下共有 17 學科。[140]這是頗具規模的大學了，不過歷年的畢業生人數不多，且日本人遠多於臺灣人。例如 1944 年畢業生 357 名，臺日學生比約為 1：4。在師生比上，仍維持創校時的教師多、學生少的情況。[141]

戰後臺北帝大如同所有日本殖民政府轄下的公家機構，歷經中華民國政府的接收過程，接收情況容筆者於此省略。總之，1945 年 11 月 15 日代理盟軍的新統治當局接收臺北帝國大學，面交給前臺北帝大總長安藤一雄（1883-1973）「移交事項」一紙，安藤交出官印 85 顆、移交清冊 65 冊。這應該是臺大校慶訂在 11 月 15 日的原因；戰前「臺北帝國大學記念日」（等同今天的校慶）是 5 月 17 日。[142]接收時的學校組織有 5 學部、預科、附屬醫學專門部、圖書館，以及 3 個研究所（見圖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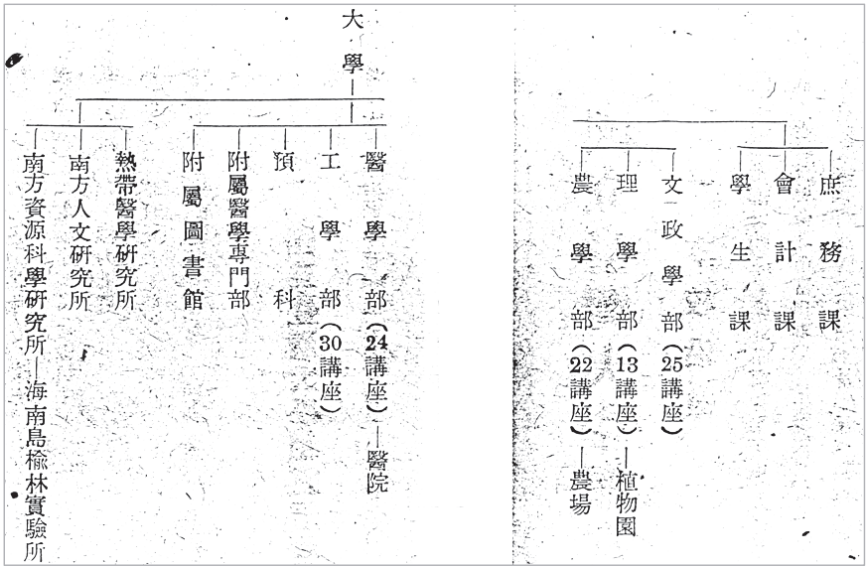
140 以上引用自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書房，2012〔2006〕），頁 18-19。

141 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頁 19。歐素瑛也指出，臺灣學生集中於醫學部，若扣除醫學部，臺日學生比例則為 1：8。

142 〈臺北帝國大學通則・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昭和三年三月十七日認可）〉第 2 條第 7 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時教職員及工役人數，合計專任 1,416 人、兼任 198 人；學生人數，大學生 863 人、預科生 586 人、醫專生 318 人，共 1,767 人，內有臺籍學生共 351 人，日本學生 1,411 人，韓國學生 5 人。[143]國立臺灣大學之前曾一度稱為國立臺北大學，1946 年 1 月正式改名為「國立臺灣大學」；[144]反觀臺北帝國大學正式創設前原稱為臺灣帝國大學，恰成有趣的對比。



圖五　1945 年 11 月 15 日臺北帝國大學被接收時的組織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編輯，《國立臺灣大學概況》，頁 2-3。

接收初期，原來的史學科改為史學系，學生的學習內容說有「劃時代」的變化，應不為過。茲將 1947 年的新課程羅列於下：

143 國立臺灣大學編輯，《國立臺灣大學概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47），頁 3。

144 引自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頁 20-25。臺灣大學還曾有命名為「國立倉海大學」的建議，見吳俊瑩，〈「臺灣大學」校名的由來與軼聞〉，《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2011 年 5 月 26 日，https://goo.gl/v5Ajp2（2018 年 6 月 2 日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必修科目（62 學分）：中國近世史、中國斷代史、西洋近世史、西洋斷代史、亞洲諸國史、西洋國別史、中國史學史、中國地理總論、中國沿革地理、史學方法、史學通論、專門史、畢業論文或研究報告。

選修科目（30 學分以上）：中國古代史研究、民俗學、考古學、傳記學、人類學、歷史學科教材與教法、社會心理學、中國史學名著選讀、西洋史學名著選讀、國語或日文。[145]

從中可以看出課程內容偏重中國歷史和地理，其次是西洋史。戰後臺灣在體制上的「中國化」，這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具體案例。不過，戰後的史學系仍有一點點臺北帝大的影子，例如畢業論文或研究報告列為必修科目，選修科目有民俗學、考古學和人類學，似乎可看作臺北帝大史學科必修「土俗學・人種學」的遺留，只是改為選修。

這時候，史學科國史學、東洋史學、南洋史學三專攻的分法已成歷史，只是人的存在有時無法用歷史分期一刀兩斷。臺北帝大南洋史學專攻的學生張美惠，就是帶著南洋史學的興趣，繼續留在戰後改制的國立臺灣大學就讀，成為三年級學生。1946 年年底，岩生成一返回日本，張美惠停修荷蘭文，改隨桑田六郎學習東西交通史，1947 年 6 月提出畢業論文〈關於《東西洋考》中的明代中暹交通〉，畢業後留任助教。[146]

在此必須簡略說明戰後繼續留在臺灣大學任教的日籍教師。根據《接收台北帝國大學報告書》的名單，[147]留用日籍教授共 89 名，但時局紊亂，實際情況有所出入。例如按照名單，文學科有 4 名教授，實則有 8 名，包括教授桑田六郎（東洋史學）、岩生成一（南洋史學），副教授小葉田淳（1905-2001，國史學），以及助教長岡新治郎。[148]他們原

145 國立臺灣大學編輯，《國立臺灣大學概況》，頁 39。

146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59。

147 名單見國立臺灣大學編製，《接收台北帝國大學報告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45），未標頁碼。

148 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頁 45-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屬不同講座，但在代理校長羅宗洛（1896-1978，1945 年 10 月-1946 年 5 月在任）的規劃下，都屬於南洋史學講座。[149]不過，1946 年 12 月岩生成一、小葉田淳、長岡新治郎返回日本，次年 2 月發生二二八事件，3 月 11 日清晨，以校務委員身分代理文學院院長的林茂生（1887-1947?）被帶走失蹤。到 3 月下旬，臺灣學生無人到校，學校通知 3 月 26 日正式上課，學生註冊報到限 25 日截止，逾期不到者取消學籍。[150]

關於林茂生被捕，其後顯然遇害，李東華（1951-2010）從陸志鴻校長（1897-1973，1946 年 8 月-1948 年 5 月在任）上任後，陳儀（1883-1950）的長官公署勢力伸入臺大校園的角度切入，別有所見。他指出陸志鴻校長得任臺大校長是出於長官公署主動推薦，所以頗聽命於省政當局，總務長陳世鴻（後轉任法學院院長）、文學院教授劉天宇為長官公署參事轉任，文學院副教授金祖同應亦係由陳儀援引任職，李東華認為他們向長官公署或警備總部傳遞了不利林氏的說詞。陳儀所列林氏三項罪名之二「陰謀叛亂，鼓動該校學生暴動」和「強力接收國立臺灣大學」，應即是來自臺大內部的指控。[151]實則陳世鴻在二二八事件後，仍任長官公署參事；金祖同原為長官公署參議，因就任臺大教職而辭職，[152]可見其公署背景。換句話說，陳儀的人馬堂堂進駐臺大，林茂生很可能因而喪命；政治力進入臺大，以此為嚆矢。

陳儀干涉臺大，早在羅宗洛代理校長時期就已開始，文學院和法學院院長都要由他派任，又要盡去文法科留用的日籍教授，最後導致羅宗

149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72。

150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88、93，尤其頁 95。

151 參考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第二章第三節「二二八事件與林茂生遇害」，頁 78-96。

152 金祖同於 1946 年 7 月 2 日為陳儀聘為參議，12 月 1 日以「研究考古所任」提出辭呈，12 月 3 日陳儀批「照准」。「公署參議金祖同辭職案」，〈參議人員任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 0303230062041。此份檔案係吳俊瑩先生提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洛於 1946 年 5 月辭職。[153]此外，愈來愈多的檔案讓我們略窺政治力如何在臺大運作，一件 1947 年 12 月的臺灣省警務處檔案，內容是為 10 名負責收集「高級政治情報」的線民，申請每人每月 1 萬元的交通費，10 名人員中赫然有 1 位臺大學生和 1 位臺大助教。[154] 1950 年 12 月，中國國民黨設立中央直屬的知識青年黨部，在臺大的黨部稱為「第一知識青年黨部」，組織嚴密，掌控行政、監控校園。[155]這個組織延續約半世紀，可以說是戰後變局中的新生事物，但不被看見，即使到了今天，還是一段不被看見的「校史」。

二二八事件之後，臺大的「中國化」工程更是加緊進行，自 36 學年度（1947 年 9 月）起加強文學院負責的共同教育。首先為增強臺籍青年對祖國的認識，大一學生不分院系，加強國語文課程，每週上國語課 3 小時、國文課 5 小時；其次，臺籍新生不分院系必修「中國近代史」；其三，1947 年年底教育部令臺大增設國語專修科，以培育閩、臺兩省國語教育師資。[156]

戰後的臺大文學院，在羅宗洛規劃下，最初還維持「講座」的稱法，但在其離職前，提議改稱「研究室」。[157] 1946 年 8 月陸志鴻校長上任後，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史學系有 3 個研究室，人員配置如下：

中國史學研究室：夏德儀教授，金祖同、曾憲楷副教授，
余乃鉞、裴溥言助教

南洋史學研究室：桑田六郎教授、陳荊和講師、卜新賢助教

153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63-64。

154 吳俊瑩，〈義務調查員在台大〉，「吳俊瑩」個人臉書，2018 年 6 月 18 日，https://goo.gl/3GppuV（2018 年 6 月 18 日檢索）。

155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臺北：稻鄉出版社，1998），頁 119-126。至 1953 年 6 月，共計有 9 個知識青年黨部，第二是省立師範學院（1952 年 12 月成立，該校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第九是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1953 年 6 月成立）。

156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108-109。

157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48-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土俗人種學研究室：陳紹馨教授、宮本延人副教授[158]

南洋史學研究室多了 2 個陌生姓名：陳荊和（1917-1995）、卜新賢，隨後介紹。戰後初期文學院其實等於停擺，1947 年 10 月 31 日召開第一次院務會議，會中決議中文系、外文系、史學系、哲學系各設若干研究室。第二年（1948）寒假過後，史學系調整為 6 個研究室：中國史學研究室、西洋史學研究室、南洋史學研究室、日本史學研究室、民族學研究室、社會學研究室。[159]這樣的分組仍然看得出帝大史學科講座的影子。

南洋史學研究室人員配置如下，括弧內為研究題目：

主持人〔系主任〕涂序瑄教授兼
研究員桑田六郎教授（1 南洋華僑研究　2 中西交通史研究）
陳荊和講師　　（南洋史概說）
立石鐵臣講師　　（南洋美術史）
張美惠助教　　（1 亞洲天主教傳教史　2 臺灣史）[160]

陳荊和是何許人也？簡單來說，他是受過日本正統史學訓練的南洋史專家，在戰後十餘年延續了臺北帝大的南洋史研究和教學。不過，他和戰前的臺北帝大並無淵源。

1917 年 9 月 28 日陳荊和出生於臺灣臺中龍井，父親是臺中著名婦科醫生陳茂堤（1893-1977），戰後曾任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陳荊和幼年時代，父親到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從事研究工作，他跟隨父親到日本定居，在日本接受小學和中學教育，1936 年進入慶應義塾大學預科部就讀，師事松本信廣（1897-1981）。當時慶應義塾大學是日本的越南史研究重鎮，松本信廣是越南史研究大家。陳荊和在該校讀了 5 年 3 個月（1937 年 4 月-1942 年 9 月），打下厚實的越南史研究基礎，他曾為了修習法語，到東京外國語學校夜校部學習。[161]陳荊和甫從文學部史學科畢業，

158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72-73。
159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107-108。
160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108。
161 以上資訊綜合自：國立臺灣大學人事檔案，「國立臺灣大學教員履歷表」013；韓周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取得文學士學位，就在慶應義塾大學剛成立的語學研究所擔任助手。其後旋即成為日本・佛印聯邦的交換學生，前往法屬河內，在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簡稱 EFEO）廣泛閱讀研究東南亞史，尤其是越南史，並精研越南語。一個日本學者稱讚說，陳荊和以透過越南語所帶來的視野研究越南史，作為「本邦」（日本）最初的學者，「踏上了前人所未踏上的道路」。[162]他就職的單位都和南洋史研究關係密切（括弧內為擔任工作和起迄年月）：慶應義塾大學語學研究所研究員（安南語學研究，1942 年 10 月-1943 年 3 月）、民族學協會兼囑託（特殊語學研究，1942 年 10 月-1943 年 3 月）、國際學友會法日交換學生（南洋史學研究，1943 年 3 月-1945 年 8 月）。[163]在越南法國遠東學院進行研究期間，陳荊和結識越裔華人女子 ĐặngthịHòa，和她結婚。[164] ĐặngthịHòa 是「鄧氏和」，亦即「陳鄧瑜姬」。[165]認識陳荊和的賴永祥說，鄧瑜姬很會講臺語。[166]

戰後陳荊和返回臺灣，1946 年 12 月以講師職別受聘於國立臺灣大學，1948 年 9 月兼任省立師範學校講師。[167]陳荊和專精越南史，進入臺大史學系後，初期教授「亞洲諸國史」、「南洋史學名著選讀」等課程，和日籍學者桑田六郎等互相配合。日籍學者全數被遣返後，他開始教授二、三年級的「東南亞洲史」，以及三、四年級的「安南史研究」、「東南亞洲史專題研究」課程（1950-1953），之後繼續講授「東南亞洲史」

〈陳荊和教授生平考略〉，《越南歷史研究》，2016 年 3 月 4 日，http://chuansong.me/n/519448052239（2018 年 2 月 20 日檢索）；臺灣省諮議會：https://www.tpa.gov.tw/opencms/digital/area/past/past03/member0026.html（2018 年 2 月 20 日檢索）。

162 川本邦衛，〈史記に対う慧眼——陳荊和博士を悼む〉，《慶應義塾大学言語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28 號（1996 年 12 月，東京），頁 12。

163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檔案，「國立臺灣大學教員履歷表」013。

164 韓周敬，〈陳荊和教授生平考略〉。

165 川本邦衛，〈史記に対う慧眼——陳荊和博士を悼む〉，頁 12。

166 許雪姬等訪談，賴永祥等紀錄，《坐擁書城：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頁 234。

167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檔案，「國立臺灣大學教員履歷表」0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基礎課程，並增開「南洋華僑史」和「華僑史研究」等課程。[168]在研究方面，陳荊和表現突出，到校不到 4 年，就在 1950 年 8 月升任副教授；1956 年 8 月升等教授。[169]李東華稱讚他是「最具日本史學實質傳承內涵的學者」。[170]

1957 年越南順化大學成立，1958 年陳荊和受邀擔任該大學訪問教授，其後又接受西貢大學和大叻大學的教職，教授「中國史」、「日本史」和「東南亞史」。[171]在臺大的檔案中，可以看到陳荊和於 1958 年 9 月 1 日「留職停薪一年」，第二年「續予留職停薪一年」，1960 年 8 月 1 日則是「49 年度不續聘」，[172]意即陳荊和辭職離開臺大了。這是因為順化大學欲成立漢學院，再聘陳荊和留任 3 年，陳荊和於是辭掉臺大教職。[173]李東華認為「這不止是臺大歷史系的損失，也是臺灣專業史學傳承上的莫大損失」。[174]

1962 年，陳荊和轉赴香港任教，1966 年獲得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75]陳荊和在香港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近 20 年（1962-1981），對香港的學術發展貢獻很大，不惟奠定了東南亞史（含華僑史）研究的厚實基礎，也開啟了香港的日本史研究。[176] 1981 年陳荊和在香港退休後，再度回到日本，任創價大學教授，1993 年赴美，1995 年 11 月 19 日在「舊緣之地」的越南西貢過世。[177]陳荊和是越南研究的國際級學者，

168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188-189。

169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檔案，「國立臺灣大學教員履歷表」013；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189。

170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191。

171 韓周敬，〈陳荊和教授生平考略〉。

172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檔案，「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動態登記表」009。

173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191。

174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191。

175 韓周敬，〈陳荊和教授生平考略〉。

176 參見周佳榮，〈陳荊和及其東亞史研究〉，《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第 3 期（2005，香港），頁 121-130。

177 川本邦衛，〈史記に対う慧眼——陳荊和博士を悼む〉，頁 11、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就很高，日本學者川本邦衛（1929-2017）在悼念文中，對其成就有精要且全面的敘述。[178]

至於南洋史學研究室助教卜新賢是誰？必須先說明臺北帝大「南方人文研究所」，和戰後臺灣大學「華南人文研究所」之間的關係。

南方人文研究所，在戰爭期間的 1943 年設立，和大東亞戰爭中的南進政策息息相關，屬於學術動員的一環。戰後臺北帝大改制為國立臺灣大學後，它和熱帶醫學研究所、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被一併保留。[179]李東華認為南方人文研究所在羅宗洛校長時改名為華南人文研究所，[180]其實羅宗洛是說南洋人文研究所「應改稱華南人文研究所」，語意含混。臺大校史檔案顯示華南人文研究所的「庶務教務關係書類」是從「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起」，[181]且該研究所在 1945 年 12 月 1 日就開始聘用雇員和傭工，兩位助教也在 1946 年 4 月 1 日聘任，[182]而南方人文研究所至晚運作到 1946 年 2 月，[183]兩個單位似乎同時並存過。總之，二者的關係尚待進一步研究。

華南人文研究所由法學院院長周憲文（1907-1989）兼任所長，兩位助教是朱家貴、卜新賢，皆為浙江人、25 歲；並有雇員陳清秀、僱工陳甘，都是臺灣人，年齡分別為 30、18 歲。[184]朱家貴和卜新賢是上海暨南

178 川本邦衛，〈史記に対う慧眼——陳荊和博士を悼む〉，頁 13-20。

179 國立臺灣大學編輯，《國立臺灣大學概況》，頁 3。

180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49、76。他的憑藉應該是根據羅宗洛校長 1946 年 5 月 11 日發表的〈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之「1 院系之改造與充實」的（六）「南方人文研究所，注重華南、南洋之人文研究，應改稱華南人文研究所……」（頁 45-46）。

181《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uh0239001_0001。

182《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uh0240000_0002、0005、0007、0008 等。

183《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uh024000_0015、0037。

184《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uh0239001_0081、0122、0149。不過，另一份檔案顯示 1946 年 1 月朱家貴 24 歲、卜新賢 26 歲，見 ntul-uh0239001_0012。根據國立臺灣大學人事檔案，「國立臺灣大學人員登記表」014，卜新賢當時 25 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學畢業生，周憲文是該校經濟系教授，可能因為這層關係而來臺灣。[185]根據臺大人事檔案，卜新賢畢業於暨南大學文〔學〕院史地系，擔任華南人文研究所助教，薦舉人是該所所長周憲文。[186]暨南大學主收東南亞華僑學生，原本就有東南亞研究的傳統，[187]以此，周憲文主持該研究所，學生朱家貴和卜新賢來臺就職，有研究上的脈絡可循。1946 年 11 月 16 日，陸志鴻校長通知華南人文研究所，「據本校第六次校務會議議決華南人文研究所應暫時停止工作」，[188]這個研究所被解散。朱家貴因此離臺返回中國，卜新賢仍然留在臺大，轉任史學系助教，在南洋史學研究室工作，時在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前。[189] 1947 年 8 月，剛在 7 月畢業的張美惠受聘為史學系助教，職責是「管理圖書室以及研究工作」。[190]張美惠成為卜新賢的同事，兩人發生戀情。1947 年年底卜新賢被以匪諜罪逮捕，並被臺大解聘，1949 年卜出獄後，兩人旋即結婚。[191]

關於卜新賢的案子，根據臺大檔案，他在 1947 年 12 月 8 日晚上 6 時許，在臺大昭和町單身宿舍內「被人誘出失蹤」，校方於 11 日發文給臺灣全省警備司令部司令彭孟緝（1908-1997），「請調查本校助教卜新賢下落」，因「事關全校員生安全」。[192] 1948 年 2 月 2 日，卜新賢失蹤將近兩個月後，彭孟緝發公函給臺大，事由為「貴校助教卜新賢參加共產黨案已移送法院審辦」；說明：一、貴校史學系助教卜新賢參加共產黨充任要職經本部拘案訊據供認不諱；二、已將該卜新賢連同案卷移

185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187。

186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檔案，「國立臺灣大學人員登記表」014。

187 可參考張振江，〈暨南大學的東南亞研究〉，《東南亞研究》2007 年第 6 期（廣州），頁 13-17；應佳，〈華僑。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東南亞研究》1996 年第 3 期（廣州），頁 6-7。

188 《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編號 ntul-uh0239001_0041。

189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187。

190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檔案，「國立臺灣大學教員履歷表」075。

191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187-188。

192 〈請調查本校助教卜新賢下落〉，《調查卜新賢下落》（臺北：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9200000Q/0036/3500300/008/0001/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送臺灣高等法院檢查處依法審辦；三、請查照。[193]臺大當局於是依公教人員懲戒法之規定，解聘卜新賢。[194]當時他可能涉入紀裕常案，[195] 1949 年 2 月才被釋放，同年 5 月和張美惠結婚。[196]

卜新賢離職後，1952 年在賴永祥的邀約下，和張美惠 3 人一起撰寫《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外事篇〉，然在 1953 年張美惠獲得勞神父（Arturo Rodriguez）的賞識，推薦她獲得西班牙政府的夫婦獎學金，兩人因忙於準備出國等事情，此書一直要到 1960 年才刊行。[197]張美惠在 1954 年 8 月由助教升等為講師，1955 年 1 月因出國而辭聘。[198]張美惠在辭職書中寫道：

> 謹啟者：鄙人自畢業後即蒙留母校任職迄今七年有餘，辱承鈞長愛護良深、盡詳指導，實銘感難忘。茲以敝人已於九月間獲得西班牙政府之獎學金，擬赴該國研究南洋史，並蒐集資料，冀有益於母校……。[199]（標點為筆者所加）

回想 1944 年，張美惠申請進入臺北帝大史學科，第一志願的專攻是南洋史學，11 年後，在辭職書上，還明明白白寫著「南洋史」，給人這是她最鍾愛的研究領域之感。張美惠在語文方面具有研究南洋史的充分準

193 《調查卜新賢下落》，檔號 A309200000Q/0036/3500300/008/0001/002。

194 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頁 158。

195 香港《文匯報》記者鍾震囑咐紀裕常返臺工作，交付 5 項任務，包括「託帶函轉達卜新賢，謂匪上級促卜即刻赴港。紀裕常返台後，將卜函付郵」，見《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資料庫》（Taiwan Holocaust），https://sheethub.com/billy3321/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page=217（2018 年 2 月 20 日檢索）。

196 許雪姬等訪談，賴永祥等紀錄，《坐擁書城：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頁 222-223；賴永祥，〈臺灣省通志稿　卷三政事志外事篇-全一冊〉，《賴永祥長老史料庫（Elder John Lai's Archives）》，2004 年 4 月補記，http://www.laijohn.com/works/work6.htm（2018 年 2 月 21 日檢索）。

197 賴永祥，〈臺灣省通志稿　卷三政事志外事篇-全一冊〉。

198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檔案，「國立臺灣大學教員履歷表」075。

199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檔案，張美惠辭職相關公文，檢視人員（姓名略）於 2017 年 11 月 2 日 11:50 檢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備，她的第一外語是英文、第二外語是德文，後來分別向岩生成一、箭內健次學習荷蘭文、西班牙文，戰爭期間還向臺北經濟專門學校（原為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於 1944 年改稱）的竹村猛（1914-1987）學習法文。[200]總而言之，張美惠懂英、德、荷、西、法等西方語言，加上日文、中文和臺語，語言訓練非常充分，代表臺北帝大南洋史學專攻的高標竿。張美惠辭去臺大教職，其實有不得不然的苦衷，並非如辭職書所言「辱承愛護，銘感難忘」。她對臺大是不滿意的，包括圖書館欠缺新書、她的論文被某位教授盜用等。[201]從具體表現來看，張美惠具有學術研究的興趣，也很有著述動力，如前所述，她在《民俗臺灣》刊登的文章〈臺灣の家庭生活〉，獲得金關丈夫賞識，並為臺北帝大教授宮崎孝治郎在其論文〈生態支那家族の制度と其の族產制〉中引用。[202]戰後張美惠曾用筆名「辛逕農」，於 1951-1952 年在《臺灣風物》創刊號發表〈郭懷一抗荷事蹟考略〉，分三回刊完，[203]這應該是臺灣戰後第一次有人用荷蘭文獻寫文章吧？一位年輕女助教能在《臺灣風物》創刊號發表文章，反映了她和當時臺灣文史知識社群有相當密切的交往。她之所以採用筆名，除了因為郭懷一是反政府的叛亂人物，有政治上的顧忌外，[204]也有其他考慮。[205]

李東華指出：「張美惠女士是光復初期歷史系唯一畢業生，也是受帝大史學科完整訓練的最後一人。彼通西班牙文，曾習荷蘭文，專攻南

200 所澤潤，〈台湾人女子最初の帝大生〉，頁 52。

201 該教授在張美惠和卜新賢定居西班牙後，也盜用卜新賢的研究成果；但如何盜用，口述紀錄未給細節。所澤潤，〈台湾人女子最初の帝大生〉，頁 53。

202 張美惠，〈金関丈夫氏と『民俗台湾』と台北帝大と〉，頁 64。宮崎孝治郎該篇論文發表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政學科研究年報》第 8 輯（1942 年 5 月，臺北），頁 9-232：引用長谷川（張）美惠之文章，在頁 106-107。

203 這三回分別為辛逕農（張美惠），〈郭懷一抗荷事蹟考略〉、〈郭懷一抗荷事蹟考略（續）〉、〈郭懷一抗荷事蹟考略（完）〉，《臺灣風物》創刊號（1951 年 12 月，臺北），頁 25-29、2 卷 1 期（1952 年 1 月），頁 26-28、2 卷 2 期（1952 年 2 月），頁 29-31。

204 所澤潤，〈台湾人女子最初の帝大生〉，頁 53-54。

205 見許雪姬等訪談，賴永祥等紀錄，《坐擁書城：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頁 2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洋史。畢業後留任歷史系助教，在南洋史研究室工作，原係利用帝大舊藏資料，傳承日人史學之最佳人選。」[206]讚賞之情溢於言表。賴永祥也說：「她受教於桑田六郎、岩生成一、箭內健次、小葉田淳等教授，跟岩生學過荷蘭文，跟箭內學過西班牙文，專攻中西交通史。」[207]就學術傳承而言，實在因緣俱足。她個人也很努力，1951 年 12 月在《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3 期發表〈明代中國人在暹羅之貿易〉，1954 年升等為講師，就在第一學期開設「泰國史」（2 學分）。她和夫婿、賴永祥共同撰寫的〈政事志・外事篇〉，被認為是通志稿中極為優秀的著作；卜新賢後來也仍然有一些著述。[208]

張美惠在 1955 年辭職遠赴西班牙，1960 年陳荊和辭職到越南任教，李東華說：「陳氏與張美惠的先後離去，也是臺北帝大南洋史學與東亞・東南亞水域史研究脈絡的消沈。」[209]水域史現在稱為海洋史。如果陳荊和、張美惠能留在臺大任教，我想臺大的歷史系會很不一樣，臺灣的學術界也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樣態，然而，這一切的一切，很難說不是歷史的必然。臺北帝大的南洋史學終究無法傳承，其後是數十年的空白。

就臺大南洋史學的發展而言，張美惠離開臺大是個損失，就她個人人生而言，也是很大的失落。根據她自己的講法，她原本希望能辦理留職，但最後被迫必須辭職，且遲了半年才得以離開臺灣到西班牙，導致獎學金中斷，生活困頓。1956 年張美惠完成馬德里大學的博士課程，在學術機構擔任無給職的研究員，卜新賢則在中華民國大使館工作。1972 年，張美惠和卜新賢分別在馬德里大學擔任「日本學」和「漢學」講師，1973 年 3 月西班牙和中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大使館關閉，兩人喪失教職。為了生活，夫妻於 1974 年開始經營中餐館，至 1994 年結束營業。[210]張美惠是臺北帝大極少數臺灣人女性大學生之一，登上了當時不

206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187。
207 賴永祥，〈臺灣省通志稿　卷三政事志外事篇-全一冊〉。
208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188。
209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 191。
210 所澤潤，〈台湾人女子最初の帝大生〉，頁 54-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止是殖民地，也包括內地女性知識青年能登上的高峰，她在戰前具有強烈的漢民族意識（廣義「日本人」中的漢民族），[211]因此戰後的際遇，格外令她有刺痛之感吧？晚年她痛心說道：戰前人生一路順遂，戰後變成「中國人」，命運截然錯亂起來。[212]

代結語：中斷的年代、再續前緣

陳荊和雖然不是臺北帝大培養的南洋史研究人才，但他傳承的是日本的學術傳統，這個傳承在他離開後完全中斷了。陳荊和在臺大最後開課是 1958 年春夏間（民國 46 學年度第 2 學期，簡記為 46-2，下同），講授「東南亞洲史」和「華僑史研究」，每週各 2 小時。從該學年度課表可見院系必修課程包括修習全年的「三民主義」。[213]這門課從 1947 年就是全臺大學生的必修課（圖六），一直到 1964 年 6 月（52-2），[214] 1964 年 9 月（53-1）改為「國父思想」，[215] 1993 年 9 月這種目的在灌

211 透過前引所澤潤的口述紀錄，可以清楚知道張美惠有很強的「漢民族」意識，自矢「一定要當不輸日本人的日本人」（〈台湾人女子最初の帝大生〉，頁 50）；另外，在所澤潤報告這篇口述紀錄的投影片顯示，日本戰敗之後，張美惠「自主地學習中國語」。見所澤潤，〈台湾人女子最初の帝大生、国立台湾大学最初の女子卒業生——故・張美恵氏のスベインでの聴取りを通して〉（最早的臺灣人女帝大生／國立臺灣大學最早的女畢業生：故張美惠女士在西班牙的訪談紀錄），「口述歷史研究之方法與課題——帝國支配、脱殖民地及新的國境」研討會會議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殖民地史料研究群、口述歷史室；臺灣口述歷史學會主辦，2014 年 8 月 30-31 日）。

212 所澤潤，〈台湾人女子最初の帝大生〉，頁 52。原文：「終戦まで全てスムーズに行ったのですが、終戦後、中国人になった途端に、運命が狂いだしました。……私もオートマチックに『中国人』になった訳です。そして一線と引いたように狂いだし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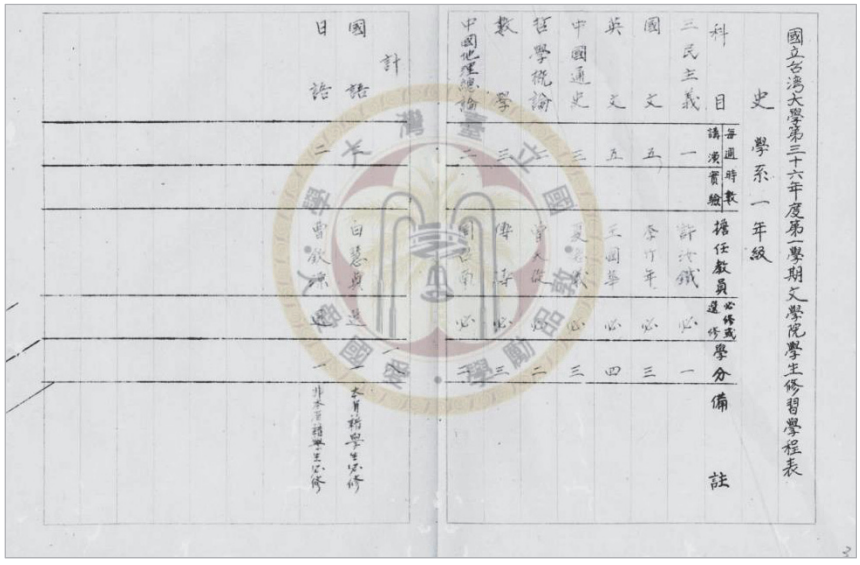
213 《臺灣大學歷年課程表數位典藏》：「文學院・歷史學系」，http://140.112.113.50/course/046-02/046-02-1-1030-00.pdf（2018 年 5 月 20 日檢索）。

214 《臺灣大學歷年課程表數位典藏》：「文學院・歷史學系」，http://140.112.113.50/course/052-02/052-02-1-1030-00.pdf（2018 年 5 月 20 日檢索）。

215 《臺灣大學歷年課程表數位典藏》，http://course.lib.ntu.edu.tw/?q=category/term/347（2018 年 5 月 20 日檢索）。由於改課程牽涉到師資和其他問題，從「三民主義」改為「國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輸政黨意識形態的必修課程才完全取消，由「中憲與立國精神領域」取代，[216]其後的發展姑不細述。這類全校必修的政治課程，可以說是臺北帝大和臺灣大學嚴重斷裂的一個具體例證。


國立台灣大學第三十六年度第一學期文學院學生修習學程表

史學系一年級

科目	每週時數 講授 實驗	擔任教員	必修或選修	學分	備註
三民主義	一	許冠三	必	一	
國文	五	李行年	必	三	
英文	五	王國華	必	四	
中國通史	三	許冠三	必	三	
哲學概論	二	李	必	二	
體育			必		
中國地理概論	二		必	二	
國語	二				
日語	二				
計				十	

圖六　第 36 年度第 1 學期（1947）國立臺灣大學史學系學程表（頁一）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歷年課程表數位典藏》：「文學院・歷史學系」，http://140.112.113.50/course/ 036-01/036-01-1-1030-00.pdf（2018 年 5 月 20 日檢索）。

戰後的臺大歷史系，不管研究或授課，主要是以中國史為重心，西洋史以授課為主。[217]在張美惠及陳荊和離開之後，南洋史學的研究和教

思想」，臺大有些系在時間上有落差，於此不一一寫明，留待日後研究臺大課程變革者進一步梳理。

216 「中憲與立國精神領域」1997 年改為「本國憲法與公民教育領域」，2000 年第 2 學期（88-2）析為「本國憲法」與「公民教育」，各為半年的課，直到 2007 年 6 月（95-2）才消失。前者見《臺灣大學歷年課程表數位典藏》，http://course.lib.ntu.edu.tw/?q=category/term/429，後者見 http://course.lib.ntu.edu.tw/?q=category/term/434（2018 年 5 月 20 日檢索）。

217 關於臺大歷史學系的研究和教學特色，見陳弱水，〈臺大歷史系與現代中國史學傳統〉，《臺大歷史學報》第 45 期（2010 年 6 月，臺北），頁 127-1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可謂一片空白。1966 年 9 月（55-1）開始，張奕善（1927-2015）在歷史系設「東南亞洲史」，[218]他是馬來西亞僑生，1963 年取得臺大歷史系碩士學位，[219]和日本／臺北帝大的南洋史學在學術脈絡上毫無關係。1960、70 年代以來，在中國史當道的歷史系氛圍中，東南亞歷史的課只能聊備一格（1947- 1967 年臺大歷史系課程，見附表二）。

臺北帝大的南洋史是包括臺灣史的。在臺大歷史系，雖然楊雲萍（1906-2000）從 1947 年第一學期就開設「臺灣史」的課程，[220]後來也持續間隔地開設，但他以明史學者自居，他的臺灣史研究和教法有很濃厚的個人風格，與臺北帝大的學術傳統無太大關連，容我於此不予深論。總之，1960 年以後，臺北帝大的南洋史學傳承中斷，然而由於一些奇特的因緣，這個傳統竟然在中斷 26 年後（1958-1984），再度和臺灣大學連結起來。這個過程具有某種傳奇性，而貫串這個故事的主人翁是曹永和。

曹永和不是臺北帝大的學生，他自學成功，最後在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授課，並成為中央研究院罕見的只有高中學歷的院士，[221]他也獲得臺大名譽博士學位，堪稱是臺灣學界，甚至是臺灣社會的傳奇。這段經歷膾炙人口，有專書可供參考，[222]不需贅言。筆者想簡單敘述，曹永和如何接續臺北帝大的南洋史學研究。

前面提過南洋史學講座有村上直次郎教授、岩生成一助教授／教授，以及箭內健次講師／助教授，三人皆為重鎮型的學者。1946 年，曹

218 《臺灣大學歷年課程表數位典藏》：「文學院．歷史學系」，http://140.112.113.50/course/055-01/055-01-1-1030-00.pdf（2018 年 5 月 20 日檢索）。

219 張奕善的碩士論文是〈明代中國與馬來亞的關係〉，見臺大歷史系網頁，「碩士論文目錄．60 年以前」：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c_pub_papersR60.htm（2018 年 5 月 25 日檢索）。

220 《臺灣大學歷年課程表數位典藏》：「文學院．歷史學系」，http://140.112.113.50/course/053-01/053-01-1-1030-00.pdf（2018 年 5 月 25 日檢索）。

221 該院院士中，數學家華羅庚（1910-1985）也只有中學學歷，但他沒來臺灣。

222 如曹銘宗，《自學典範：台灣史研究先驅曹永和》（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上引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以及無數的採訪紀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永和從士林搬到臺北，生病住院一年，這年年底岩生成一返回日本；1947年 3 月，也就是二二八事件三月屠殺正進行中，曹永和進入臺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公餘之際開始自學的歷程。這時桑田六郎還留在臺大歷史系，曹永和去旁聽桑田教授的「東西交通史」，當時正式修課的學生有張耀錡、何廷瑞、宋文薰。何、宋二人興趣轉到考古學，曹永和回憶說，那堂課最認真的反而是他這個旁聽生。[223]桑田六郎是臺北帝大東洋史學講座的教授，治東西交通史，曹永和深受桑田看重，因而與日本史學傳統接上頭。

桑田六郎返回日本之後，曹永和與他保持聯繫，不過曹永和的興趣慢慢轉到荷蘭時代的臺灣史研究。由於日本的學術標準是：要研究哪一國的歷史，就要學那一國的語言（臺灣學界這方面的要求仍有不夠嚴格之處）；由於工作和研究的需求，曹永和開始自修外國語文，含德文、法文、西班牙文，以及荷蘭文，其中以荷蘭文最為重要。[224]曹永和利用文獻開始撰寫論文，他將兩篇著作〈明代臺灣漁業志略〉、〈荷蘭與西班牙佔據時期的臺灣〉分別寄給桑田六郎和岩生成一，深獲後者欣賞，希望他能加入東洋文庫的研究團隊。經過一番曲折，曹永和終於順利赴日，加入岩生成一的研究團隊，為期一年（1965 年 5 月-1966 年 4 月）。曹永和抵達日本時，岩生成一已從東京大學退休，轉至法政大學任教，在曹永和滯日期間，岩生成一利用每週四東洋文庫休館的時間，在東洋文庫會議室指導曹永和讀古荷蘭文，共進午餐後繼續研習荷蘭文。[225]以此，曹永和實質上受教於岩生成一，不僅止於「私淑」。岩生成一有意培植曹永和，據曹永和自述：「岩生老師在臺灣教書多年，雖然臺北帝大南洋史曾有一位臺灣學生張樑標，卻始終沒有一位臺灣學生可以繼承他的學術，這是他最引以為憾的事。岩生老師希望我的加入（按，加入

223 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頁 58-89、251-252。
224 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頁 90-94。
225 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頁 108、110-1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東洋文庫研究團隊），能適時彌補他的缺憾。」[226]中村孝志也告訴過曹永和：岩生老師有意培養他，成為他留在臺灣的根。[227]

東洋文庫的訪問開啟了曹永和的學術之路，不過，因為他不具在大學任教的學歷，一直在臺大圖書館工作，直到 1984 年 8 月獲聘為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臺大歷史系才能根據這個資格聘他為兼任教授，開始在該系授課。第二年，也就是 1985 年 10 月，曹永和自臺大圖書館退休，仍持續在臺大歷史系授課，至 2010 年 6 月為止，[228]當時已近 90 高齡。他在臺大歷史系兼任授課，前後 26 年，時間頗長，培養、影響無數學子，被譽為「海洋史大家長」。[229]

雖然曹永和不是專任教師，不過，他能以傑出的海洋史研究，以及持久力極強的講學精神，到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學，實在可以說是經過一段空白後，臺大再續臺北帝大南洋史研究和教學的前緣。近十年來臺大開設了不少東南亞語言、考古、歷史、藝術，以及文學方面的課程，[230]似乎給人臺大多少有回到臺北帝大的創校宗旨，即「以臺灣．東洋．南洋之自然界及人文界為對象之學術研究」的態勢，但南洋（約當今大東南亞區域）部分可能仍以「教學」為重，離「研究」還有一段距離。一個研究．教學機構的前身和後身，歷經 90 年，在嚴重的斷裂當

226 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頁 110。

227 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頁 111。

228 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序 1、頁 253。

229 陳昀秀，〈海洋史的大家長——曹永和院士（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網頁：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public_html/tsao/tsao_talk2.html；原刊於《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通訊》第 1 期（2008 年 9 月，臺北），頁 15-17；陳昀秀，〈海洋史的大家長——曹永和院士（下）〉，《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通訊》第 2 期（2008 年 12 月，臺北），頁 20-22。

230 人類學系最早有東南亞相關課程，從 2004 年（93-1）起。其他：藝術史 2007 年（96-1）起；語言 2008 年（96-2）起，有泰文、越南文、馬來文、印尼文、菲律賓文；政治經濟／國際關係，2009 年（98-1）起；文化／文學，2015 年（103-2）起；歷史，2016 年（105-1）起。以上相關課程，見《台大課程網搜尋系統》：https://nol.ntu.edu.tw/nol/guest/index.php（2018 年 5 月 28 日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或許依稀還看得到有所連結之處。

在臺北帝大・臺大 90 周年慶的前夕，當臺大的課程顯示臺大似乎在「臺灣・東洋・南洋」的大地圖中有重新尋找自我定位的樣態，謹以此文略記其前世今生中的一個小環節。

*在本文的寫作和修改過程，獲得很多人士的協助，謹此誌謝：吳俊瑩先生、所澤潤教授、許妝莊小姐、陳力航先生、陳翠蓮教授、陳慧先博士、葉碧苓教授、詹幼華小姐、廖述英先生、賴永祥先生、鍾淑敏教授。二位匿名審查者給予寶貴的修改建議；本文今（2018）年 5 月 31 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講論會發表時，與會師生給予的意見，讓本文得以減少錯誤，較為完善，在此一併致上謝意。

（責任編輯：石昇烜　校對：李　頎　洪麗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一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共通及各專攻必修科目變革表
（1928-1941）

年　代	1928-1930 （昭和三至五年）		1931-1941 （昭和六至十六年）	
共通／專攻項目	必修科目名稱	單位數	必修科目名稱	單位數
史學科共通必修科目	無		史學概論	1
			國史概說	1
			東洋史概說	1
			南洋史概說	1
			西洋史	1
			地理學	1
			土俗學・人種學	1
國史學	國史學概說	7	國史特殊講義	6
	國史學特殊講義		國史講讀及演習	
	國史學講讀及演習		東洋史	2
	土俗學・人種學	1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及政學科ニ屬スル科目ノ中選擇履修スヘキモノ	5
	東洋史學	3		
	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	2		
	南洋史學	1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及政學科ニ屬スル科目ノ中	4		
東洋史學	東洋史概說	6	東洋史特殊講義	6
	東洋史特殊講義		東洋史講讀及演習	
	東洋史講讀及演習		國史	2
	土俗學・人種學	1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及政學科ニ屬スル科目ノ中選擇履修スヘキモノ	5
	國史學	3		
	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	2		
	南洋史學	1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及政學科ニ屬スル科目ノ中	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　代	1928-1930 （昭和三至五年）		1931-1941 （昭和六至十六年）	
南洋史學	南洋史概說	5	南洋史特殊講義	4
	南洋史特殊講義		南洋史講讀及演習	
	南洋史講讀及演習		國史	2
	土俗學・人種學	1	東洋史	2
	國史學	3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及政學科ニ屬スル科目ノ中選擇履修スヘキモノ	5
	東洋史學	3		
	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	2		
	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及政學科ニ屬スル科目ノ中	4		

資料來源：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三年》，頁 51-53、《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六年》，頁 49-50、《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5），頁 58-59、《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二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7），頁 64-66、《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三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8），頁 62-64、《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四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9），頁 67-69、《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六年》，頁 66-68。

說　　明：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於 1928-1941 年間歷經六次改正（修改），但從 1931 年至 1941 年史學科課程要求並無變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二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共同必修、必修和選修科目（1947-1967）

類別	必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1947 年		
文學院共同必修科目（50 學分）	三民主義	4
	倫理學	3
	國文	6
	英文	4
	外國文	6
	中國通史	6
	世界通史	6
	哲學概論	4
	理則學	3
	自然科學	6
	社會科學	6
史學系必修科目（69 學分）	中國近世史	14
	中國斷代史	9
	西洋近世史	4
	西洋斷代史	9
	亞洲諸國史	6
	西洋國別史	3
	專門史	6
	中國地理通論	4
	中國沿革地理	3
	中國史學史	3
	史學方法	3
	史學通論	3
	畢業論文或研究報告	2
史學系選修科目（合計30學分以上）	中國古代史研究	3
	民俗學	3
	考古學	3
	傳記學	3
	人類學	3
	歷史學科教材與教法	4
	社會心理學	3-4
	中國史學名著選讀	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別	必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西洋史學名著選讀		6
	國語或日語		2
1955 年			
院共同必修科目（共 44-46 學分）	語言	國文	8
		英文	8
	人文學科	中國近代史	4
		三民主義	4
		中國通史	6
		哲學概論	6
		俄帝侵略中國史	2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必選，包括：政治學（6）、經濟學（6）、社會學（4）、法學緒論（6）〕	4-6
		國際組織與國際關係	2
	體育	體育（一）、體育（二）	0
主科及有關科目	西洋通史		6
	考古人類學導論		6
	中國近代史		6
	英文史學選讀		6
	中國上古史		6
	西洋通史		6
	史學研究〔必選科目，包括：中國史學史（4）、西洋史學史（4）、史學方法（4）〕		4
其他必修科目	地學通論		6
	理則學		4
選修科目	秦漢史（6）、隋唐五代史（6，大二以上）、宋史（4）、遼金元史（6）、明史（6）、明清史（6）〔以上選 2-3 門〕		10-12
	西洋上古史（6）、西洋中古史（6）、西洋近古史（3）、西洋現代史（4）〔以上選 2 門〕		7-12
	美國史（6）、東南亞洲史（6）、日本史（6）、近代印度史（6）、英國史（6）〔以上選 1 種〕		6
	臺灣史（6）、中國古代社會研究（4）、清史文獻學（4）、中日關係史（6）、中國外交史（4）、中西交通史（6）、東北史專題研究（4）、史通（6）、西洋史學名著選讀（4）〔以上選 1 門〕		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別	必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其他	學位論文		0
1956 年			
共同必修科目	國文		8
	英文		8
	三民主義		4
	中國通史		6
	哲學概論		6
	理則學		4
	社會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擇 1 門）		6
	國際組織與國際關係		2
	體育（一）、體育（二）		0
主科及有關科目	西洋通史		6
	考古人類學導論		6
	地學通論		6
	中國近代史		4
	英文史學選讀		6
	中國上古史		6
	西洋近世史		6
	史學研究（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史學方法擇 1 門）		4
	畢業論文		0
選修科目	中國斷代史	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遼金元史、明史、明清史	12-16
	西洋斷代史	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西洋近代史	8-12
	國別史	美國史、東南亞洲史、日本史、英國史、近代印度史、希臘史、羅馬史	4-6
	專門史	臺灣史、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清史文獻學、中西交通史、中國外交史、南洋華僑史、中日關係史、東北史研究專題、資治通鑑閱讀	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別	必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1960 年			
共同必修科目	國文		8
	英文		8
	三民主義		4
	體育（一）、體育（二）		0
	軍訓（一）、軍訓（二）		0
	哲學導論或理則學（2 門擇 1）		4
	社會科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必選一種）〕		6
	國際組織與國際局勢		2
主科及有關科目	中國通史		6
	西洋通史		6
	考古人類學導論		6
	地學通論		6
	中國上古史		6
	中國近代史		6
	中國斷代史	秦漢史（4）、魏晉南北朝史（6）、 隋唐五代史（6）、宋史（6）、遼金元史（6）、 明史（6）、明清史（6）	12-18
	西洋斷代史	西洋上古史（6）〔或希臘史（3）、羅馬史（3）， 共一學年〕、西洋中古史（6）、 西洋近古史（1500-1815）（6）、 西洋近代史（1815-1914）（6）	12-18
	國別史	東南亞洲史（6）、日本史（6）、 英國史（6）、近代印度史（6）、 土耳其史（4）、美國史（6）	4-6
	史學研究	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史學方法〔3 選 1〕	4
選修科目	2-4 年級選修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6）、清史文獻學（4）、 中西交通史（6）、中國外交史（4）、 中日關係史（6）、中美外交史（3）、 東北史專題研究（2）、華僑史研究（4）、 臺灣史（6）、史通（6）、資治通鑑閱讀（6）	二：0-6 三：8-15 四：8-15
	4 年級選修	畢業論文（4）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別	必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1961 年			
共 同 必修科	國文		8
	英文		8
	三民主義		4
	體育（一）、體育（二）		0
	軍訓（一）、軍訓（二）		0
	哲學導論（乙）或理則學		4
	社會科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必選一種）〕		6
	國際組織與國際現勢		2
主 修 及 有關科目	中國通史		6
	西洋通史		6
	考古人類學導論		6
	地學通論		6
	中國上古史		6
	中國近代史		6
	中國斷代史	秦漢史（4）、魏晉南北朝史（6）、隋唐五代史（6）、宋史（6）、遼金元史（6）、明史（6）、明清史（6）	12-18
	西洋斷代史	西洋上古史（6）〔或希臘史（3）、羅馬史（3），共一學年〕、西洋中古史（6）、西洋近古史（1500-1815）（6）、西洋近代史（1815-1914）（6）、西洋現代史（6）	12-18
	國別史	東南亞洲史（6）、日本史（6）、日本近代史（6）、近代印度史（6）、土耳其史（4）、英國史（6）、美國史（6）	4-6
	史學研究	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史學方法〔3 選 1〕	4
選修科目	2-4 年級選修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4）、清史學文獻（4）、中國近代現代史研究專題（6）、中西交通史（6）、中國外交史（4）、中日關係史（6）、中美外交史（3）、美國外史（6）、東北史專題研究（2）、華僑史研究（4）、臺灣史（6）、史通（6）、資治通鑑閱讀（6）	二：2-6 三：11-15 四：8-15
	4 年級選修	畢業論文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別	必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1962 年			
共同必修科	國文		8
	英文		8
	三民主義		4
	體育（一）、體育（二）		0
	軍訓（一）、軍訓（二）		0
	哲學導論（乙）或理則學		4
	社會科學〔社會學（甲）、政治學、經濟學（必選一種）〕		6
	國際組織與國際現勢		2
主修及有關科目	中國通史		6
	西洋通史		6
	考古人類學		6
	地學通論		6
	中國上古史		6
	中國近代史		6
	中國斷代史	秦漢史（4）、魏晉南北朝史（6）、 隋唐五代史（6）、宋史（6）、遼金元史（6）、 明史（6）、明清史（6）	12-18
	西洋斷代史	西洋上古史（6）〔或希臘史（3）、羅馬史（3），共一學年〕、西洋中古史（6）、 西洋近古史（1500-1815）（6）、 西洋近代史（1815-1914）（6）、 西洋現代史（6）	12-18
	國別史	東南亞洲史（6）、日本史（6）、 日本近代史（6）、韓國史（6）、 近代印度史（6）、英國史（6）、美國史（6）	4-6
	史學研究	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史學方法〔3 選 1〕	4
選修科目	2-4 年級選修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4）、清史學文獻（4）、 中國近代現代史研究專題（6）、 中西交通史（6）、中國外交史（4）、 中日關係史（6）、中美外交史（3）、 美國外交史（6）、東北史專題研究（2）、 臺灣史（6）、華僑史研究（4）、 史通（6）、資治通鑑閱讀（6）	二：2-6 三：11-15 四：8-15
	4 年級選修	畢業論文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別	必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1964 年			
共同必修科	國文		8
	英文		8
	國父思想		4
	體育（一）、體育（二）		0
	軍訓（一）、軍訓（二）		0
	哲學導論（乙）或理則學		4
	社會科學〔社會學（甲）、政治學、經濟學（必選一種）〕		6
	國際組織與國際現勢		2
主修及有關科目	中國通史		6
	西洋通史		6
	考古人類學導論		6
	地學通論		6
	中國近代史		6
	中國斷代史	中國上古史（6）、秦漢史（4）、 魏晉南北朝史（6）、隋唐史（6）、 五代史（6）、宋史（6）、遼金元史（6）、 明史（6）、明清史（6）、中國近代史（6）	12-18
	西洋斷代史	西洋上古史(6)〔或希臘史(3)、羅馬史(3)，共一學年〕、西洋中古史（6）、 西洋近古史（1500-1815）（6）、 十六至十八世紀歐洲史（6）、 西洋近代史（1815-1914）（6）、 西洋現代史（6）	12-18
	國別史	東南亞洲史（6）、日本史（6） 日本近代史（6）、韓國史（6）、 近代印度史（6）、英國史（6）、美國史（6）	4-6
	史學研究	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史學方法〔3 選 1〕	4
選修科目	2-4 年級選修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6）、清史文獻學（6）、 中國近代現代史專題討論（6）、 中西交通史（6）、中國外交史（4）、 民國政治史（4）、中日關係史（6）、 中美外交史（3）、美國外交政策（6）、 西洋文化史（6）、西洋近代外交史（6）、 東北史專題研究（6）、臺灣史（6）、	二：5-9 三:11-15 四:14-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別	必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資治通鑑閱讀（6）、戰國策（6）、 英文史學選讀(6)、日文歷史名著選讀(6)、 滿文（8）、蒙文（6）	
	4 年級選修	畢業論文	4
1967 年			
共同必修科	國文		8
	英文		8
	國父思想		4
	體育		0
	軍訓		0
	地學通論		6
	考古人類學導論		6
	英語聽講實習		2
	國際組織與國際現勢		2
	哲學概論或理則學		4-6
	社會學		6
主科及有關科目與選修	中國通史		6
	西洋通史		6
	中國近代史		4-6
	中國斷代史	中國上古史（6）、秦漢史（6）、 魏晉南北朝史（6）、隋唐史（6）、 五代史（6）、宋史（6）、遼金元史（6）、明史（6）、明清史（6）	12-18
	西洋斷代史	西洋上古史(6)〔或希臘史(3)、羅馬史(3)，共一學年〕、西洋中古史（6）、 西洋近古史（6）、西洋近代史（6）、 西洋現代史（6）	12-18
	國別史	東南亞洲史(6)、日本史(6)、韓國史(6)、 近代印度史(6)、英國史(6)、美國史(6)、 拉丁美洲史（6）、土耳其史（4）	4-6
	地方史	臺灣史（6）	
	專史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4）、清史文獻學（4）、 中西交通史（4）、中美外交史（6）、 中日關係史（4）、近代中日關係（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別	必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華僑史研究（4）、東北史專題研究（4）、資治通鑑導讀（6）、史部要籍解題（6）、史通（6）、國史選讀（8）、文藝復興史（6）、中國斷代史專題討論（6）、中國近代外交史（4）、中美外交史專題（4）、西洋外交史專題研究（6）、英文史學選讀（4）、日本史學名著（4）、國內史學討論（2）、外國史學討論（2）	
	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史學方法〔3選1〕		4
＊附註：畢業論文列為選修，及格者給予4學分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歷年課程表數位典藏》：「文學院．歷史學系」http://course.lib.ntu.edu.tw/?q=taxonomy/term/181（2018年1至5月之間數度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參議人員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調查卜新賢下落》。臺北：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9200000Q/0036/3500300/008/0001/001、A309200000Q/0036/3500300/008/0001/002。

中村孝志撰，陳俐甫譯，〈台北帝大的日子〉，《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 年 4 月，臺北，頁 176-178。

松本巍撰，蒯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手稿本）。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臺灣舊籍影本。

張美惠（筆名辛逕農），〈郭懷一抗荷事蹟考略〉、〈郭懷一抗荷事蹟考略（續）〉、〈郭懷一抗荷事蹟考略（完）〉，《臺灣風物》創刊號，1951 年 12 月，臺北，頁 25-29、2 卷 1 期，1952 年 1 月，頁 26-28、2 卷 2 期，1952 年 2 月，頁 29-31。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檔案，「國立臺灣大學人員登記表」01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資料室藏。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檔案，「國立臺灣大學教員履歷表」013、073、07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資料室藏。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檔案，「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動態登記表」00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資料室藏。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檔案，張美惠辭職相關公文，檢視人員（姓名略）於 2017 年 11 月 2 日 11:50 檢視。

國立臺灣大學編製，《接收台北帝國大學報告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45。

國立臺灣大學編輯，《國立臺灣大學概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47。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南天書局，1995 復刻 1939 年版。

〈臺北帝國大學通則・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昭和三年三月十七日認可）〉，收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中ヲ改正ス。

《校史檔案第二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檔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久保島天麗編，《臺灣大學設立論》。臺北：臺灣大學期成同盟會，1920。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1-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ヲ定ム。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02-昭和 3-台北帝国大学官制ヲ改正ス。

岩生成一，〈長崎代官村山等安の臺灣遠征と遣明使〉，《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一輯，1934 年 5 月，臺北，頁 283-359。

岩生成一，〈豊臣秀吉の臺灣招諭計畫〉，《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七輯，1942 年 8 月，臺北，頁 75-118。

長谷川美惠，〈臺灣の家庭生活（上）、（中）、（下）〉，《民俗臺灣》第 2 卷第 4 號，1942 年 4 月，臺北，頁 16-21、第 2 卷第 5 號，1942 年 5 月，頁 12-15、第 2 卷第 6 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42 年 6 月，頁 25-27。
長谷川美惠，〈祖母の死をめぐつて〉，《民俗臺灣》第 2 卷第 12 號，1942 年 12 月，臺北，頁 34-35。
長谷川美惠，「點心」（無篇名），《民俗臺灣》第 3 卷第 3 號，1943 年 3 月，臺北，頁 22。
宮崎孝治郎，〈生態支那家族の制度と其の族產制〉，《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政學科研究年報》第 8 輯，1942 年 5 月，臺北，頁 9-232。
張美惠，〈金関丈夫氏と『民俗台湾』と台北帝大と〉，《日本歷史》第 595 號，1997 年 12 月，東京，頁 60-64。
鄉原正雄，〈拾六七世紀に於ける呂宋島の日本人〉（手稿本）。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藏，編號(T)731.26 2771，條碼 2240702。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三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28。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四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29。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五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0。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六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1。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5。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二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7。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三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8。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四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9。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六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41。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七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43。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八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44。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昭和十四年十一月調〕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卒業生名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臺灣舊籍影本。

二、近人研究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吳俊瑩，〈「臺灣大學」校名的由來與軼聞〉，《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2011 年 5 月 26 日，https://goo.gl/v5Ajp2（2018 年 6 月 2 日檢索）。
吳俊瑩，〈義務調查員在台大〉，「吳俊瑩」個人臉書，2018 年 6 月 18 日，https://goo.gl/ 3GppuV（2018 年 6 月 18 日檢索）。
周佳榮，〈陳荊和及其東亞史研究〉，《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第 3 期，2005，香港，頁 121-130。
邱景墩、陳昭如，〈戰前日本的帝國大學制度與台北帝國大學〉，《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 年 4 月，臺北，頁 1-6。
姜皇池，《國際法與臺灣：歷史考察與法律評估》。臺北：學林文化，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洪子偉主編，《存在交涉：日治時期的臺灣哲學》。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6。

張振江，〈暨南大學的東南亞研究〉，《東南亞研究》2007 年第 6 期，廣州，頁 13-17。

曹永和編，《臺北帝大的生活——國立臺灣大學創立七十週年校慶特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9。

曹銘宗，《自學典範：台灣史研究先驅曹永和》。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

許雪姬、張隆志、陳翠蓮訪談，賴永祥、鄭麗榕、吳美慧、蔡說麗紀錄，《坐擁書城：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7。

陳明哲編，《榮耀與分享：台大創校六十週年特刊》。臺北：台大創校六十大慶籌備會出版部，1988。

陳昀秀，〈海洋史的大家長——曹永和院士（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網頁：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public_html/tsao/tsao_talk2.html；原刊於《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通訊》第 1 期，2008 年 9 月，臺北，頁 15-17。

陳昀秀，〈海洋史的大家長——曹永和院士（下）〉，《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通訊》第 2 期，2008 年 12 月，臺北，頁 20-22。

陳昀秀整理，周婉窈校訂，〈臺大歷史系八十週年系慶講座：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研究——曹永和教授主講〉，《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 2 期，2009 年 2 月，臺北，頁 6。

陳弱水，〈臺大歷史系與現代中國史學傳統〉，《臺大歷史學報》第 45 期，2010 年 6 月，臺北，頁 117-154。

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 年 4 月，臺北，頁 72-98。

陳偉智，《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陳隆志，〈台灣的國際法地位〉，《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7 期，1999 年 9 月，臺北，頁 4-12。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臺北：衛城出版，2017。

葉碧苓，〈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7 期，2008 年 9 月，臺北，頁 1-35。

葉碧苓，〈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比較（1926-1945）〉，《臺灣史研究》第 16 期第 3 卷，2009 年 9 月，臺北，頁 119-125。

廖述英（筆名杜英），〈臺北帝大總共收過多少個女學生？〉，《台北帝大專欄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部落格，2018 年 2 月 15 日，https://taihokuimperialuniversity.blogspot.tw/2018/02/blog-post.html（2018 年 2 月 15 日檢索）。

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書房，2012（2006）。

蔡錦堂，〈日本治臺後半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收入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頁 316-31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賴永祥，〈臺灣省通志稿　卷三政事志外事篇-全一冊〉，《賴永祥長老史料庫（Elder John Lai's Archives）》，2004 年 4 月補記，http://www.laijohn.com/works/work6.htm（2018 年 2 月 21 日檢索）。

應　佳，〈華僑。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東南亞研究》1996 年第 3 期，廣州，頁 6-7。

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訪問，吳美慧、謝仕淵、謝奇峰、蔡峙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

鍾淑敏、許賢瑤，〈中村孝志教授と台湾史研究（完全版）〉，《天理臺灣學報》第 26 號，2017 年 7 月，奈良，頁 17-46。

韓周敬，〈陳荊和教授生平考略〉，《越南歷史研究》，2016 年 3 月 4 日，http://chuansong.me/n/519448052239（2018 年 2 月 20 日檢索）。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臺北：稻鄉出版社，1998。

川本邦衛，〈史記に対う慧眼——陳荊和博士を悼む〉，《慶應義塾大学言語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28 號，1996 年 12 月，東京，頁 11-25。

天野郁夫，《帝国大学——近代日本のエリート育成装置》。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7。

辻直人，〈二十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文部省留学生の派遣実態とその変化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東京大学史紀要》第 26 卷，2008 年 3 月，東京，頁 21-38。

吳密察，〈植民地に大学ができた！？〉，收入酒井哲哉、松田利彦編，《帝国日本と植民地大学》，頁 75-106。

李恒全，〈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史に関する一考察〉，《神戸大学発達科学部研究紀要》第 14 卷第 1 號，2006 年 10 月，神戸，頁 45-54。

京都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史》。京都：京都帝國大學，1943。

永原慶二監修，石上英一等編輯，《岩波日本史辭典》。東京：岩波書店，1999。

所澤潤（採訪紀錄、解說、註解）、張寬敏（口述），〈聴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II）台北一師附小、台北高校、台北帝大医学部を経て、台湾大学医学部卒業〉，《群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人文・社会科学編》第 44 卷，1995 年 3 月，群馬，頁 139-187。

所澤潤，〈台湾人女子最初の帝大生、国立台湾大学最初の女子卒業生——故・張美惠氏のスペインでの聴取りを通して〉（最早的臺灣人女帝大生／國立臺灣大學最早的女畢業生：故張美惠女士在西班牙的訪談紀錄），「口述歷史研究之方法與課題——帝國支配、脫殖民地及新的國境」研討會會議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殖民地史料研究群、口述歷史室與臺灣口述歷史學會主辦，2014 年 8 月 30-31 日。

所澤潤，〈台湾人女子最初の帝大生——長谷川みエと張美惠〉，《段丘》第 19 號，2015 年 9 月，東京，頁 46-56。

松田吉郎、陳瑜，〈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南洋史学の成立と展開〉，收入酒井哲哉、松田利彦編，《帝国日本と植民地大学》，頁 251-284。

酒井哲哉、松田利彦編，《帝国日本と植民地大学》。東京：ゆまに書房，20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黑羽夏彥，〈中村孝志著作目錄〉，《ふぉるもさん・ぷろむなあど》部落格，2016 年 3 月 5 日，http://formosanpromenade.blog.jp/archives/55993247.html（2018 年 2 月 7 日檢索）。

瀧井一博，〈植民地帝国大学のエートス——台北帝国大学初代総長幣原坦の思想形成〉，收入酒井哲哉、松田利彦編，《帝国日本と植民地大学》，頁 45-74。

三、網路資源

〈臺大圖書館校史資料　臺北帝國大學卒業論文〉目錄，http://web.lib.ntu.edu.tw/speccoll/node/144（2017 年 9 月 5 日檢索）。

《台大課程網搜尋系統》，https://nol.ntu.edu.tw/nol/guest/index.php（2018 年 1 月至 5 月間數度檢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位校史館・臺北高等學校網站》，http://archives.lib.ntnu.edu.tw/exhibitions/Taihoku/chronology.jsp（2018 年 1 月 25 日檢索）。

《臺灣大學歷年課程表數位典藏》，http://course.lib.ntu.edu.tw/（2018 年 1 至 5 月數次檢索）。

《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資料庫》（Taiwan Holocaust），https://sheethub.com/billy3321/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page=217（2018 年 2 月 20 日檢索）。

士林國小，http://www.slps.tp.edu.tw/introduce/leading.asp?id={BFB22B67-A86E-4499-980F-48D5DA832767}（2017 年 11 月 11 日檢索）。

國立臺灣大學創校 90 年校慶標語競賽，http://event.ntu.edu.tw/ntuslogan/rules/（2018 年 1 月 3 日檢索）。

臺大歷史系：「碩士論文目錄・60 年以前」，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c_pub_papersR60.htm（2018 年 6 月 2 日檢索）。

臺灣省諮議會，https://www.tpa.gov.tw/opencms/digital/area/past/past03/member0026.html（2018 年 2 月 20 日檢索）。

《中野文庫・帝國大學令》，http://www.geocities.jp/nakanolib/rei/rm19-3.htm（2018 年 6 月 2 日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61 (June 2018), pp. 17-95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8.61.02

Nanyō-shi as Research Chair and as a Major at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its Postwar Legacy

Chou,Wan-yao*

Abstract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TIU) was established in 1928, and its success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is celebrating its ninetie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To d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chool back to the Japanese era has become a trend in Taiwan since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n 1987. Nonetheless, the changing hands of rulership in 1945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aiwan, and the rupture between TIU and NTU seems to be greater than the continui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Nanyō-shi* (the history of Southern Seas), and aims to present *Nanyō-shi* as Research Chair (*kōza* in Japanese) and as a major (*senkō* in Japanese) and its postwar developments.

This article first deals with the founding of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discusses the last-minute change of university name from Taiwan Imperial University to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The stated goal of the University was to study the natural world and cultural phenomena of Taiwan, *Tōyō* (East Asia, mainly China and Korea) and Nanyō. This means that locality determined the direction of scholarship, and as a result the Research Chair and Major of *Nanyō-shi* were established at TIU, which did not exist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s of other Imperial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R.O.C.);
E-mail: wanyaochou@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anyō-shi as Research Chair, a major, and the organization and curricula related to them.

Who came to major in *Nanyō-shi* at TIU? Based on university archives, this article offers a more complete account of the *Nanyō-shi* major than previously understood, especially during the wartime perio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Nakamura Takashi and Chō Mie, the two students who maintained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postwar Taiwan. Chō Mie continued to study at NTU and joined the NTU faculty after her graduation. Later on, Chen Ching Ho, a Japan-trained historian of Vietnam, also joined the faculty. Chō Mie and Chen Ching Ho continued the scholarly tradition of *Nanyō-shi* until around 1960. After a long 26-year absence of *Nanyō-shi* at NTU, Ts'ao Yung-ho revived it, now as a branch of maritime history, and has made it thrive again.

Keywords: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Nanyō-shi*, maritime history, Nakamura Takashi,Chō Mie, Chen Ching Ho, Ts'ao Yung-h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